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公共政策研究季刊

IPP Quarterly

郑永年 主编

中国外交的文明底蕴与实践逻辑
专题 | 霍尔木兹危机与美国新战略
会议实录 | 新时代的中国海洋战略

2026年
第二期



公共政策研究季刊

IPP Quarterly

2026 年

第二期

国家高端智库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26 年 8 月

《公共政策研究季刊》

编委会名单

主 编：郑永年

编 委：陈佳慧 戴明洁 郭 海 蒋余浩 李海滨
李明令 李品保 李 婷 廖乐伟 林辉煌
刘 佳 卢克玲 区富祝 徐伟钧 杨海燕
杨丽君 杨庭轩 余 荔 赵 巍 朱雁翎
庄文越 (按姓氏音序排列)

编 辑：李彩霞 刘 深 刘昕冉 周浩锴

卷首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之中。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全球秩序正经历深刻重塑。

本期《公共政策研究季刊》以郑永年教授的《中国外交的文明底蕴与实践逻辑》为开篇，从文明底蕴与实践逻辑的双重维度，系统阐释中国外交的战略方位，为本期季刊定位导航。

《中国外交的文明底蕴与实践逻辑》原刊于《国际问题研究》2026 年第 1 期。郑永年教授指出，理解中国外交往何处去，必须走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殖民”，回归中华文明的价值观与实践逻辑。中国外交从“有所作为”迈向“大有作为”的转型，并非西方叙事中的“国强必霸”，而是植根于“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文明传统——以主体性应对外部变局，以单边开放拓展互惠空间，以发展为主线降低合作门槛，以倡议与平台供给国际公共产品。这一文明自觉，既是理解中国外交的钥匙，也是本期诸文共同的思想底色。

第一板块“霍尔木兹危机与美国新战略”聚焦当下中东地缘变局。2026 年 2 月 28 日，美以对伊朗发起联合军事行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刺身亡，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冲突骤然升级。IPP 执行院长郭海提出理解这一变局亟需回答的三个关键问题；陈佳慧分析伊朗战事外溢风险及中国的应对之策；IPP 学术顾问梅里·马达沙希从历史与地缘双重维度剖析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伊朗战略重心的地位；廖凯揭示危机背后从劳合社到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的隐秘金融较量；IPP 深度解读团队围绕特朗普访华后中美关系的新方位展开研判；田雷教授则提醒我们，理解美国仍是认识当代世界秩序的关键课题。六篇文章从政治、军事、金融、外交等多重维度，勾勒出这场危机的全貌与走向。

第二板块“新时代的中国海洋战略”整理自 IPP 于 6 月 6 日主办的“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国际关系学学术研讨会”。吴士存教授从海洋立法与维权实践视角，梳理海洋强国战略从 1951 年周恩来声明到今日的历史演进；张海文研究员解读 BBNJ 协定、深海采矿规章、国际航运减排等全球海洋治理新进展及其对我国海洋经济的深远影响；金永明教授阐释新时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演进逻辑、阶段成效与未来任务；胡波教授辨析 21 世纪海洋战略中“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四位学者从立法维权、全球治理、战略演进、力量对比等多维视角，共同呈现中国海洋战略的立体图景。

从霍尔木兹海峡的惊涛骇浪到中国海洋战略的深远布局，从大国博弈的金融暗线到海洋治理的规则博弈，本期文章虽议题各异，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国如何以文明自觉和战略定力，在变局中开新局。这正是 IPP 作为国家高端智库持续关注与思考的方向。

目 录

【重磅文章】

中国外交的文明底蕴与实践逻辑	郑永年 3
----------------------	-------

【霍尔木兹危机与特朗普的美国新战略】

哈梅内伊被刺后，亟需回答的三个关键问题	郭海 12
---------------------------	-------

伊朗战事外溢，中国应如何应对？	陈佳慧 15
-----------------------	--------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战略重心所在	梅里·马达沙希 20
------------------------	------------

从劳合社到 DFC，霍尔木兹危机背后隐秘的金融较量	廖凯 29
---------------------------------	-------

IPP 深度解读：特朗普访华之后，如何理解今天的中美关系？	IPP 外交团队 35
-------------------------------------	-------------

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认识美国”？	田雷 45
--------------------------	-------

【新时代的中国海洋战略】

从我国海洋立法和维权实践视角看海洋强国战略的历史演进路径	吴士存 55
------------------------------------	--------

全球海洋治理新进展及其对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	张海文 59
-------------------------------	--------

新时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演进、成效与任务	金永明 63
----------------------------	--------

21 世纪海洋战略的变与不变	胡波 67
----------------------	-------

【IPP 动态】

【重磅文章】

中国外交的文明底蕴与实践逻辑

郑永年



本文刊登于《国际问题研究》2026 年第一期（总第 231 期）。英文题目为 *The Civilization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Logic of China's Diplomacy*。《国际问题研究》创刊于 1959 年，双月刊，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中国外交步入“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新征程，一些发达经济体对此感到恐惧，将其称为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中国冲击第二波”。部分西方国家把自身“国强必霸”的逻辑强加给中国，笃定中国也会随着崛起而重复西方往日走过的霸权扩张道路。中国外交到底往何处去？——如何看待中国外交战略思想及其实践，如何基于中国国家利益和实践需要开展新时期外交工作？回答这一问题，无法依赖现有基于西方意识形态与实践经验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然而，许多观点依然在使用西方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概念与理论解释中国的外交实践。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领域依然是受西方影响最深的领域之一，笔者一直把这种现象称为“思想殖民”。如果不走出这种被“思想殖民”的状态，不回归到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寻找答案，就很难回答“中国外交往何处去”这个问题。

一、中国外交转型的历史演进

自近代以来，中国外交走过了从“求生存”到“站起来”再到“富起来”的艰难历程，党的十八大之后则走上了“强起来”的进程。无论何种外交进程，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不仅仅是国家的艰难崛起，更是展现中华文明和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即开放包容、生生不息、内谋发展、外求和平，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两次鸦片战争以降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弱国无外交”的典型。尽管外交领域作了不少代价高昂的努力，但一直局限于维持国家生存的层面，中国外交的主题是“求生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彻底改变了这种格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外交逐步探索“独立自主”。改革开放使中国“富起来”了。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在总结中外历史经验之后得出结论：封闭（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为了适应世界，中国主动开放，主动和世界先进的规则规制对接，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不仅辅助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更是促成了国家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中国加入了世界体系并且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员，但中国并没有变成一些西方国家所期望的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中国在拥抱世界的同时走自己的路。二战以来，能够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主体性的国家和经济体少而又少，中国是最典型的成功案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外交从“有所作为”迈向“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时代。2014 年、2018 年和 2023 年三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了这一转型的战略定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尽管这个转型是自然的过程，但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外交变得具有“进攻性质”，这是其既有叙事框架的延伸。自改革开放以来，不管中国做与不做什么，都被西方视为“威胁”，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长期存在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叙事形态呈现。随着中国的崛起，外交政策就需要逐步调整。对崛起所带来的外部效应，中国不能置之不理，而是应当直面这些效应。如果是负面效应，中国应当想办法加以控制或者解决；如果是正面效应，中国应当加以利用，既赋能自己，也赋能他国。

“大有作为”的外交战略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继续拥抱世界，并且成为联合国体系最坚强的支持者之一。中国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走合作发展的道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党的十八大之后，为了缓解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压力，中国政府

主动对经济增长速度进行了下调。尽管如此，中国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都超过其他任何一个经济体。二是继续巩固和强化中国积极参与的区域组织，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合作机制等。三是自主的国际倡议，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四大全球倡议”。

二、中国外交的文明底蕴

文明和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外交的思想、思考和思维。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作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吸收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底蕴。

（一）中华文明价值观是中国外交的文明底蕴

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否能够扮演以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至少取决于如下三个因素：一是经济基础和基于经济之上的军事力量，即国家能力；二是政治领导的意志；三是核心文明价值观。从国家能力的角度出发，弱国无外交，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什么样的外交战略都没有意义。近代的中国就是一个例子。再者，尽管经济和军事力量存在本身就具有国际影响力，但能否把经济和军事力量用好用足则取决于政治领导层的意志；作为客观存在的力量既可以是防御性的，也可以是进攻性的。如何使用力量和力量使用的目的则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核心文明价值观。例如，“国强必霸”反映的是西方列强的核心价值观，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天下大同”等价值观是高度契合的，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文明中“天下大同”理念运用到当今全球治理与外交实践的思想延续。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这三个层面的要素是理解今天和未来中国外交的核心。

（二）中华文明底蕴中的“开放主体性”与现代性逻辑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中国是一个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维度上没有中断的世俗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是因为世俗文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生生不息。就和外部关系来说，中国世俗文明两个最大的特点是：

第一，开放包容，但坚守关键政策选择与制度安排的主体性。开放包容，就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举措，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在拥抱世界和融入世界的同时走自己的路。近代以来，因为现代化先发生在西方，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中，现代化常被视为“西方化”。经验地看，无论是非西方国家输入式的现代化还是西方国家输出式的现代化，在国际实践中成功的少而又少，而失败的居多。其中，既成功实现现代化又能够保持独立的案例则更少。在诸大国中，中国是唯一既获得了发展也保持了独立的大国。

第二，中国践行“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观，即在发展起来之后，关怀世界的发展。这一源自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强调个体或者国家在自身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应主动承担相应责任，以自身发展惠及他人或者兼济天下。这一精神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实践中有着鲜明体现。中国古代在对外交

往中秉持“厚往薄来”的政策，外国使臣通过向中国进献礼品，不仅可以获得比其所送礼品价值更大的回送礼品，更可以获得与中国贸易往来的权利。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古丝绸之路不仅将丝绸、瓷器、茶叶等物产输送至沿线各地，更将中国先进的农耕技术、医药知识、天文历法等文明成果向外传播，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在富裕起来之后，努力推动实现世界的共同富裕。或者说，在成功实现现代化之后，中国还要把自己爬上来的梯子伸出去，鼓励和帮助其他国家也爬上来。例如，在中非合作中，中国主张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张开怀抱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加大单边开放力度，赋予全球化新的动力。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这一表态展现了当代中国对“达则兼济天下”的生动诠释。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会把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强加于他国；在对外合作框架中强调“自主选择”，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三、实践逻辑：制度化外交斗争、赋能发展与重塑秩序的复合外交大战略

中国文明的核心精神体现在当代外交政策上，有如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以制度化外交斗争维护国家主体性

在国际层面和外交领域，坚守主体性就必然意味着需要进行国际斗争。这尤其表现在对现代化的理解和对现代化模式的追求上。如前所述，在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中，中国坚守住了独立的思想、思考和思维，并形成了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模式。

现代化首先发生在欧美国家的历史事实，使得讨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就不得不讨论这个国家和欧美国家的关系。基于此，从现实的案例分析中可以总结出几种主要的经验现象。一是那些不能拥抱西方世界的国家，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很难实现现代化。或者说，这些国家被欧美国家孤立之后，很难在被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二是那些高度依赖欧美国家但又没有被它们所接受的国家，也就是体制外依附西方的国家，也没有能够实现现代化。虽然一些国家早期通过和西方的关联获得了发展，但此后失去了发展的自主性，而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三是那些在拥抱西方世界的同时不能坚持主体性的经济体也出现了严峻的问题。如近几十年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二战后，美国有两项外交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一是针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通过实施这一计划，美国在帮助西欧国家实现经济复兴的同时也获得对这些国家极大的影响力。二是美国的东亚政策，一方面帮助日本和“四小龙”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机制很大程度上攫取了对这些经济体的干预能力。不过，在获得经济发展的同时，接受美国这种现代化方式对上述经济体也形成了诸多掣肘。对这些经济体来说，当美国有能力为它们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比如市场开放）的时候，这些经济体就获得了发展；但是一旦当美国没有能力或者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为它们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时候，它们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制约。今天，无论是欧洲还是日韩等经济体都面临这个问题，因为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像历史上一样为它们提供近乎不受限制的市场开放这一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了。

中国的实践路径则与上述美国的现代化模式存在本质不同。中国通过拥抱世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的有机部分，并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自主角色。这背后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始终坚守主体性。如果要问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能够像中国一样，在获得发展的同时坚守主体性？部分原因可归结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因为中国体量庞大，欧美国家不能放弃这个庞大的市场，也不能强迫中国变成一个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从这一维度来说，中国有足够的力量抵制外部的各种演变。

但更主要的因素在于中国的文明底蕴有能力在吸收、消化西方实践中优点的同时恪守主体性。这尤其表现在中国领导层坚定的政治意志上。就现代化进程而言，中国近代初期也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弯路，当时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做了不少西方化的实践，但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但是现如今，中国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将现代化的概念等同于“西方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根植于本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不仅如此，中国近年来已经开启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客观来说，在现代化进程中，在物质层面可以学习其他国家；但一旦失去知识上的独立性，则必将误入歧途、迷失方向，最终导致现代化建设失败。

中国的国际斗争尤其体现在和美国的斗争进程中。因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导致一些人看到中国要和美国斗争就变得忧心忡忡。针对这种现象的关键问题在于，不通过斗争是否能够求得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呢？经验地看，21 世纪的中美关系是“斗而不破”，并且在斗争中推进中美关系的稳固发展。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美国即发动针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对等关税”战争，中国是第一个也是最主要一个进行公开反制的国家。在 2025 年 10 月 30 日的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之前，中国针对美国的芯片战略毅然推出了稀土等关键矿产反制政策。2025 年中美之间共计五轮谈判，两国经过斗争反而斗出了初步共识。在这五轮谈判中，中国通过斗争取得四点关键成果。

一是有效弱化了特朗普在谈判中的强硬姿态。自特朗普政府发动“对等关税”战之后，美国在绝大多数双边谈判中普遍取得优势，但在和中国的谈判中则遇到了强大的反击力量。西方社会的现实主义者总说“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上”。而在特朗普“对等关税”战中，正是因为精准有力的反制，中国不仅在餐桌上，而且占据了好几个席位（即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和尊重）。二是打破了特朗普政府的单方面幻想。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施加限制（“卡脖子”），另一方面又要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并且相信两者可以同时推进。中国稀土新规的颁布等同于直接对特朗普政府说“不”。三是中美之间找到了对等原则。中国通过稀土新规对美国实施了精准有效的反制，对美形成了不对称战略压力，为今后中美之间的谈判找到了更多的武器。四是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华文明底蕴中“止戈为武”的古老哲学，即找到这些武器，不是为了使用它们，而是为了威慑并阻止美国滥用其所拥有的武器。理性与和平是中国从古至今最坚定的追求。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和衷共济等理念反映了中国文化崇尚和平、主张平等的一贯追求，体现了中国人民尊崇多元包容、携手合作的博大胸怀。

正因为这样，在风云激荡的关税战、贸易战之下，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从容自信，“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彰显了我们的硬核实力，赢得了国际社会尊重”。通过斗争而获得的胜利果实是实实在在的。人们对今后的中美关系较前些年相比更加乐观了。今天，中美关系正在逐渐形成一种“阶

梯式递进”的趋势。今后，斗争依旧不可避免，但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为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为了塑造一种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二）以发展合作赋能世界发展

中国在贫穷的时候，“穷则独善其身”，反思为什么会落后。但在富裕起来之后，中国则践行“达则兼济天下”，这意味着帮助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在内部，中国追求共同富裕；在外部，中国追求共同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推动更加包容的全球发展，打造人人重视发展、各国共谋合作的政治共识，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科技创新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有利环境，反对以邻为壑、“小院高墙”、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曾达到 50%，迄今依然维持在 30%左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各种扶贫事业，帮助本国 8 亿多人口脱离绝对贫困，这为世界扶贫事业作出了最大份额的贡献。

中国要推动更加普惠的全球发展，坚持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避免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外溢影响，维护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今天，中国在包括绿色和数字经济等诸多领域都拥有了先进技术，中国也乐于和西方社会分享。尽管相关技术也是西方国家所追求的，更是受西方社会欢迎的，但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政治力量把其视为是风险，甚至是威胁。对此，中国没有必要过于在意，因为只要保持先进，部分西方国家的封闭只能导致其最终的落后。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努力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关系既不像部分西方国家所说的“拉帮结伙、针对某些国家”，也不像全球南方内部的一些国家那样搞排他性的政策，而是聚焦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关注的发展问题。尽管全球南方面临诸多挑战，但核心问题是围绕发展的。中国在发展方面拥有全球南方国家所需要的成功经验。今天，现代化正在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追求，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可以助力全球南方的发展。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关系不可动摇的根基。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不会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把本国的经验强加于他国之上。中国成功经验的核心在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如果要成功，那就必须找到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模式。在技术层面，中国拥有从低端到高端的几乎所有的发展所需的技术。尽管在少部分技术领域，中国还处于追赶世界最先进的阶段，但中国目前所拥有的技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有建设意义的。

（三）以倡议平台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体现大国担当，坚持弘扬独立自主精神，坚持引领和平发展，坚持促进世界稳定和繁荣。中国外交并非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为了更大更远更高的目标，至少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实现可持续的内部发展。内部的可持续发展是基础，没有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任何外部的作用都无从谈起。根据“十五五”规划，到203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实现崛起，未来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目标更需要进一步深度参与全球化。没有人会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孤立主义来实现这一目标，也就是说，中国要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实现这个目标。

二是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度型开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最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国际公共产品之一。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不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所需，也是履行大国责任所在。在这方面，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领域，中国已经形成了高水平的开放系统。第一，包容性多边主义。和一些国家排他性的多边主义不同，中国的制度型开放秉承包容性多边主义。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包括人权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些国家实行“多边主义”是为了针对第三国，中国的多边主义是针对所有国家面临的问题。第二，制度型开放，即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开放。在上述领域，中国一方面维持和世界标准高水平对接，另一方面也积极参与旧规则的修订和新规则的制定，同时也根据中国的经验贡献新的规则。第三，单边开放。单边开放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单边开放目标有二：1.通过单边开放来获取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资源；2.通过单边开放主动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中国将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今天，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正在从免签政策、对最不发达国家的零关税、制造业准入等向更多领域扩展和延伸。制度型开放强调规则层面的对接，单边开放则强调在特定经贸或科技领域以非对称制度安排降低准入门槛；二者相结合共同呈现了前文框架中“能力、意志与价值观”的完整实践机制。

三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二战之后确立起来的以联合国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今天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由于美国的霸权回撤和肆意单边行动，当前的国际体系已进入旧体系解体和新体系待形成之际，这一体系格局的最终形态走向还未可知，如果各个大国能够围绕新秩序体系达成共识并共同推进积极改革，新的国际秩序则有可能发展定型。而如果各大国各行其是、不积极维护和改革现有国际秩序体系，则现有国际秩序的作用发挥希望渺茫。

现有国际秩序面临新一轮的调整改革，这也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起点。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要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这些年来，中国已经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既描绘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展望，也是改革国际秩序的总体方法论，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应对国际安全挑战、促进文明互学互鉴、加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引领。应当指出的是，中国提出这些倡议，并不意味着要单方面主导这些倡议，或者把这些倡议强加于他国之上。恰恰相反，这些倡议是中国给国际社会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要构建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各国都可以通过这些平台进行互动，找到共同的利益，达成共

识，共同参与推动国际秩序的调整与重塑。简言之，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才能实现。

四、结语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指导伟大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和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波澜壮阔的中国外交实践，在解决我国外交工作面临的一个又一个重大问题过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是对中国外交实践的高度概括和升华，又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行动指南。总结实践经验，同时兼顾“虚实结合”、做到“知行合一”，中国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愈演愈烈之时，坚定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公正的“稳定锚”。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中国外交的独特性在于将价值理念制度化、将战略选择工具化、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平台化的能力。

构建外交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任务，需形成结合实际的学术体系、可检验的因果机制与可复用的政策评估工具。一方面，以核心文明价值观为外交政策作引领；另一方面，以制度型开放、发展赋能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为实践载体，呈现中国外交主动作为、勇于担当的战略风范。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47 页。
- [2]《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 111 页。
- [3]《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 94 页。
- [4]《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 38 页。
- [5]参考徐波：《对古代东亚朝贡体制的再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17 年第 3 期。
- [6]《习近平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全文）》，中国政府网，2018 年 9 月 3 日。
- [7]《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全文）》，中国政府网，2021 年 9 月 22 日。
- [8]《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 38 页。
- [9]《商务部公告 2025 第 61 号公布对境外相关稀土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决定》，商务部网站，2025 年 10 月 9 日。
- [10]《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 121 页。
- [11]杜尚泽、许诺：《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人民日报》2025 年 12 月 14 日，第 1 版。
- [12]《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 155 页。
- [13]《“十四五”时期——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 30%左右》，中国政府网，2025 年 7 月 10 日。

[14]"Lifting 800 Million People Out of Poverty – New Report Looks at Lessons from China's Experience," World Bank Group, April 1, 2022.

[15]《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 155 页。

[16]《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 147 页。

[17]《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 199 页。

[18]《李承健：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我国明确 2035 年奋斗目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2025 年 10 月 29 日。

[19]《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 159 页。

[20]《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 46 页。

[21]《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 150 页。

[22]《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 63 页。

【霍尔木兹危机与特朗普的美国新战略】

哈梅内伊被刺后，亟需回答的三个关键问题

郭海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

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开展联合军事行动，对伊朗多个城市发动空袭，并对伊朗高层进行暗杀。当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证实遇刺身亡。期间，伊朗也对美国发动了一定程度的反击，向位于以色列、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3月1日，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3月2日，特朗普表示，愿意与伊朗新领导层对话；但伊朗方面回应称，不会进行谈判。

几个关键的问题是：伊斯兰共和国政权会遭到颠覆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对全球经济影响几何？美以和伊朗是否会继续谈判？

第一，伊斯兰共和国政权会遭到颠覆吗？

特朗普声称，此次行动的目标就是“政权更迭”。在一个似乎是提前录好的视频中，他表示，伊朗人民正迎来“几代人以来唯一的机会”，去“接管你们的政府”。但现实状况并没有那么简单。从伊朗政治体制的结构特点和其国内局势而言，虽然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害，但伊朗的政体并不会在战火下就此瓦解。

对于最高领袖身亡的情况，伊朗政府已有后备方案。根据伊朗宪法，国家最高领袖由专家会议负责选举、监督和解职；如果最高领袖身亡、辞职或被解职，专家会议需尽快推选并任命新的领导人。目前，伊朗总统等三人临时代行最高领袖职权。专家会议正在讨论哈梅内伊的继任者。

伊朗的国家机器并没有停止运转。在制度设计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高度分散化，面对内外动荡有着较强的体制韧性。虽然哈梅内伊作为最高领袖，主导了伊朗最重要的政策制定权，但至少在形式上，伊朗政体有着“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即议会掌握立法权、总统及其内阁掌握行政权、法院掌管司法权。此外，哈梅内伊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常规军是分开运作的。这意味着，即使宗教领袖被杀死，伊朗政府依然可以正常运转。

伊朗政治精英内部并没有出现可以导致政权更迭的严重政治分裂。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有强硬派和改革派，两者有路线之争，而在反美、反以色列战略问题上没有根本争议。而且，美国和以色列此次行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伊朗的波斯民族主义。许多伊朗群众视哈梅内伊被杀为波斯民族的“国

耻”，其愤怒情绪很容易被调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哈梅内伊死去，伊朗也不可能被亲美派系掌权；相反，恰恰由于哈梅内伊的死，新一届的伊朗领导人在对美、对以政策上会更加强硬。

虽然在美西方的长期制裁下，伊朗因经济困顿，多地已经爆发民众抗议，但历史地看，在政治精英内部没有出现严重分歧和斗争的情况下，民怨本身很难形成有组织的反政府运动。在利比亚的卡扎菲政府案例中，当时利比亚反对派与美西方的军事介入里应外合，推翻了卡扎菲。但这种情况在伊朗尚未发生。美国和以色列也没有像小布什政府发动的“反恐战争”期间那样，派遣地面部队进入战场。

第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几何？

总体来看，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将对全球经济形成“短期通胀冲击、中期增长放缓”的双重压力。对于对能源进口较为依赖的经济体而言，短期会面临输入性通胀，而中长期则面临内外需承压的风险。

作为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的关键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的海运原油与液化天然气运输。一旦通行受阻，即便并非完全中断，仅仅是运输风险上升、保险费用飙涨与市场恐慌预期，也足以推动国际油价剧烈波动。3月2日，国际油价已上涨8%，达到每桶78.78美元。有美国智库分析认为，国际原油价格会上涨至每桶130美元的高位。

能源价格的跃升将通过燃料、发电、化工原料等渠道，迅速向全球产业链传导，引发广泛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资本流向美元资产与黄金，大宗商品与股市波动加剧，全球增长预期下调，形成“能源冲击—通胀抬升—增长放缓”的连锁反应。高度依赖外部能源进口的经济体，如日本与韩国，将在能源成本上升与生活负担加重的双重压力下收缩内需。若油价长期维持高位，欧洲国家也可能因通胀反弹而延后宽松货币政策。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使得进口需求减少，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

第三，美以与伊朗是否还会谈判？

哈梅内伊被刺后，特朗普旋即提出，愿意与伊朗新任领导谈判；伊朗方面则坚决拒绝了谈判选项。虽然伊朗方面态度强硬，但在未来，美以和伊朗之间更可能出现的是一种“边打边谈”的局面：贸易封锁、局部冲突、代理人战争、网络攻击、暗杀行动与外交接触并行不悖。

美国的目标是推动伊朗去核化和确保以色列在中东区域的霸权地位。特朗普很清楚，正如朝鲜半岛危机的历史所展示的那样，一旦让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战略优势的天平将不可逆转地倒向伊朗。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悍然发动军事行动的主要动因。但由于美国国内和西方盟友对特朗普的行动持保留态度，特朗普政府很难无限制地继续向中东投注资源，更不可能亲自下场或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特朗普政府会继续采用“离岸平衡”模式，以以色列作为代理人，与伊朗进行缠斗。

另一方面，伊朗的主要目标是确保自身的政治生存。在延续伊斯兰共和国政体的核心利益上，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的神职阶层高度一致。伊朗的反制措施是通过军事袭击以及代理人的军事行动，给美国在中东的盟友（海湾国家和以色列）施压，并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地缘经济手段，给美国及其盟友（特别是海湾国家）造成最大的成本压力，以期把美国拉到谈判桌上。

预计，美伊双方会进入一个长期消耗战。直至双方都认识到不可能通过升级冲突来达成各自的目标，中东地区才能形成一定的战略平衡。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领导人的“斩首行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代战争的范式。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属于政治谈判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至少对于美国而言，当代战争已不是从低烈度冲突向高烈度冲突不断“升级”的谈判过程，而是恰恰相反，即先从高烈度冲突开始，把对方对冲突代价的认知锚定在一个高成本领域，然后再通过“边打边谈”，逐步降级。

这种“先高后低”的冲突节奏，体现出一种成本锚定战略：通过展示极端手段的可行性与决心，使对手在后续谈判中始终意识到，冲突升级的上限已经被验证，从而在心理上趋于克制。与传统“从低烈度到高烈度”的威慑递进不同，这是一种以震慑为起点的降级博弈。在此框架下，战争不再是逐层加码的压力工具，而成为重塑谈判空间的“开场动作”。

但这种“谈判”方式风险极大。其核心前提，是对对方承受成本能力与政治意志的精准判断。一旦误判，对手不仅不会因震慑而退让，反而可能将其视为生存威胁，从而采取更为激烈的反制手段。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退出机制”的缺失。任何军事行动都应服务于明确的政治目标，并与可实现的终局状态相匹配。然而，无论是在委内瑞拉还是在伊朗，特朗普都似乎没有对军事行动设定“终局”。

特朗普曾宣称要结束美国的“永恒战争”。但现在看来，他正在把美国乃至全世界推向更深的战争泥沼。

本文 2026 年 3 月 2 日首发于“IPP 评论”

【霍尔木兹危机与特朗普的美国新战略】

伊朗战事外溢，中国应如何应对？

陈佳慧

IPP 助理研究员

一、伊朗局势的最新动向

2026 年 2 月 28 日，美以抓住哈梅内伊与高层在德黑兰官邸开会的情报窗口[1]，对伊朗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精准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 40 余名伊朗情报和安全系统的前任及现任核心高官，并对伊朗导弹发射装置和军事指挥系统实施打击。

相比 2025 年 6 月的“十二日战争”军事行动，本轮行动明显升级，特朗普政府在对伊政策议程上朝以色列靠拢，从“极限施压”向推动“政权更迭”的高风险政策选项转变。

美以选择这一高风险路径基于三点判断。

第一，美以认定伊朗实力已处于最脆弱的时期。2025 年 6 月，美以通过联合军事行动重挫了伊朗的导弹库存与指挥协调能力。据此，2025 年 12 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判断，伊朗实力已被大幅削弱[2]；以色列在过去一年对伊朗代理人网络的打击、俄乌冲突对俄罗斯的牵制，也都削弱了伊朗的外部支持；去年 12 月底，伊朗爆发的大规模抗议为外部施压及推动内部政权更迭创造了机会窗口。

第二，美伊核谈判彻底受阻。美伊双方在铀浓缩红线、洲际导弹等问题上难以调和，新一轮谈判中，双方外交口径上的分歧日益明显。当外交渠道陷入僵局，通过改变领导层以重塑谈判格局成为可接受选项，也为美国军事行动提供了“合理依据”。

第三，美国“定向打击、有限介入”模式在委内瑞拉得到验证，增长了特朗普通过精准打击伊朗，以实现政权更替或软化其对美谈判立场的信心。

但美方也低估了伊朗政权的韧性。伊朗在同日宣布启动反击，对以色列本土，以及美国位于巴林、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战火迅速蔓延至全球能源命脉。

同时，由于美以对伊朗打击行动在前期酝酿已久，加上哈梅内伊年事已高，伊朗对于最高领袖“遭遇意外”早有预案。3 月 1 日，伊朗按计划成立临时领导委员会，启动新任最高领袖遴选程序。

事实上，伊朗并非如部分西方舆论所说，是“个人独裁”的脆弱体制，而是一个“制度化的神权共和国”。其宪法框架下的专家会议、宪法监护委员会、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以及革命卫队等多重机构，形成层层嵌套、相互支撑的领导网络。这种设计赋予其极强的内部适应力——即使最高领袖缺位，指挥体系也能迅速补位，政权运转仍表现出韧性。

二、伊朗政权的演变前景

哈梅内伊身亡导致伊朗最高权力出现真空，再加上美以的持续军事打击，伊朗政权演变的前景目前确实存在着高度不确定性。美国智库分析指出，伊朗权力过渡存在三种主要路径：一是体制延续，安全与宗教精英内部产生继任者，政策基本延续；二是军事主导，权力向伊斯兰革命卫队集中，内外政策更趋强硬；三是混乱崩溃，不同派别博弈导致政治碎片化。[3]

伊朗的反对派虽然多元，但体制内改革派、流亡君主派等不同的派别理念分歧巨大，缺乏组织基础，难以形成统一的替代力量。考虑到伊朗拥有复杂的政治结构、深厚的宗教基础和庞大的安全体系，美国在短期内推动“亲美转型”实现的概率较低；反而，外部的军事压力倒是可能助推强硬派势力。

然而，美以的“定点清除”威胁也可能会塑造出一个“对内保守、对外务实”的政权——美以并未清除伊朗现任总统和外长等在政策立场上更为务实或主张谈判的温和势力，而是集中打击了情报与安全系统中最忠诚、最强硬的核心圈层，包括最高领袖直接掌控的安全卫队与决策圈成员、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国家安全与情报部的现任及前任负责人。

美以的意图很直接：通过改变温和改革派与强硬派之间的权力平衡，推动政权更迭朝利于美国的方向演变，塑造出一个“对内维持高压统治、对外转向务实求发展”的新政权。

美以方面的意图是否会实现？现阶段，应密切关注伊朗内部的两类信号：

- (1) 跟进最高领袖及军方继任者情况，尤其要关注改革派总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权力博弈；
- (2) 由于美国表示无意接管政权介入重建进程，伊朗政权的未来走向更多取决于内部势力权力平衡，因此伊朗社会面的舆情走向尤为关键。

三、伊朗乱局的全球外溢效应

伊朗作为一个人口近九千万、地区与宗教影响力突出的区域大国，其局势的剧烈动荡已从地区冲突外溢为全球性冲击。这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

第一，宗教与区域政治格局可能出现深刻动荡。

伊朗最高领袖长期被视为全球穆斯林什叶派的重要宗教权威，其遇袭可能引发跨国宗教动员，甚至迅速激发跨国的民众情绪与“反美反以”抗议浪潮。比如，在哈梅内伊身亡后，巴基斯坦多次爆发反美抗议活动，位于卡拉奇的美国领事馆遭受袭击。

同样，此次地缘对抗可能进一步演变为跨教派长期冲突，加剧穆斯林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长期结构性对立。美国公开推动一个穆斯林大国的政权更迭，可能会使地缘对抗升级为跨教派长期对立。

同时，伊拉克、黎巴嫩、巴林等拥有大量什叶派人口的国家，其国内政治平衡亦可能受到外溢冲击，动摇地区多国的治理稳定与安全秩序。

第二，全球能源供应链的脆弱性再度凸显。

伊朗扼守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中国一半以上从中东进口的原油需要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国内市场。[4]在本轮军事打击中，伊朗就曾威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开放且短期内全面封锁的可能性较低，但因局势风险升高，一些油轮已暂停在该通道运输，运费亦被推至新高。[5]对全球能源供应链来说，低烈度摩擦和市场恐慌就足以推高油价、提高生产成本，进而增加通胀压力，并对依赖中东能源的经济体构成实质性威胁。

第三，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加速重塑。

尽管新一轮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削弱了以伊朗为核心的“抵抗轴心”，以色列在短期内获得军事优势。但长期来看，未来伊朗的代理人网络可能会更为分散和隐蔽。

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以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等力量，虽在军事与指挥体系上受到打击，但仍保有一定的反击行动能力。例如：也门胡塞武装已公开支持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也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作为对以色列向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打破 2024 年 11 月以来双方达成的停火协议的报复。

此外，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逊尼派国家也希望借美伊行动削弱伊朗的什叶派势力。美国智库就披露，沙特王储此前曾私下劝说特朗普尽快采取军事行动。[6]

当前，伊朗的反击仍局限于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而非这些美国中东盟友的本土。尽管如此，这一行为已经引发了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国家谴责，沙特还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支持海湾国家的防御和安全。如果这些国家在军事行动上突破中立，中东冲突长期化、扩大化的风险将显著上升。

第四，大国关系与全球战略平衡遭受冲击。

2025 年俄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落地后，俄罗斯成为伊朗的关键战略伙伴，俄方将此轮打击定性为“蓄意预谋、无端挑起的武装侵略”，美俄在中东的战略对峙将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在美俄核军控谈判受阻的大背景下，全球核战略稳定的环境更趋脆弱。

此次冲突的升级，亦对中美互动的氛围构成不利影响。伊朗是中国在中东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与金砖国家成员。中国近年来在推动沙特与伊朗的关系缓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该进展一度被视为中国在中东影响力提升的重要标志。然而，地区冲突的升温不仅削弱了中国“调解者”的形象、冲击了中国推动中东区域国家关系缓和的重要外交成果，也使特朗普计划于 3 月底进行的访华氛围蒙上阴影，加剧了大国之间的战略互疑。

四、以伊冲突长期化下的中国战略选择

相比去年“十二日战争”的有限冲突，本轮冲突的烈度和规模显然更大，在美以试图颠覆伊朗政权的最高目标之下，伊朗也必须将本轮反击视为政权的“生死存亡之战”。即便如此，冲突各方的战略考量仍有不同——以色列将彻底终结伊斯兰共和国视为长期目标；沙特等海湾盟友希望伊朗足够虚

弱，但也不愿看到其政权崩溃引发地区混乱；美国为了避免长期的军事与经济负担，仍倾向于“有限介入”。因此，美伊依旧存在着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

以色列透露，对伊朗的第一阶段打击将“持续 4 天”；特朗普则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持续四周”。在尚未实现“政权更迭”的最高目标前，美以将继续巩固斩首行动与既定军事打击的成果，最大限度地削弱伊朗势力。特朗普迄今拒绝出动地面部队，仅依赖空中与海军力量，恰恰说明了美国仍倾向于“有限介入”，以避免加剧 MAGA 阵营内“孤立主义派”与“强硬亲以派”之间的分裂。特朗普更可能将削弱伊朗实力作为阶段性的战果来提升其中期选举支持率，同时不过度被以色列的战略议程所绑架。

对中国而言，伊朗仍是中国在中东地缘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伙伴。伊以冲突直接冲击了中国在伊的经济利益与能源安全。伊朗作为“一带一路”在西亚的关键节点与中欧班列的南线枢纽，其长期不稳可能会影响跨区域联通，并通过代理人网络波及其他中资项目，影响《中伊 25 年全面合作协议》实施。

但同时，中国对伊朗乱局的处理，需将其置于整体外交大局之中加以考量。从中美关系大局出发，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意图未必针对中国，且中国也难以替代美国在中东安全架构中的核心角色。本轮美以联合军事打击充分体现出美国介入政权更迭以及在全球范围内调度军事力量的能力。

中国在中东的最大优势，在于与区域各国都保持了“去意识形态化”的深厚经贸联系。中国可凭借这一中立姿态进一步巩固“调解者”角色。“中立”并非“消极不作为”。作为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与原油买家，中国应将维护在伊利益作为长期任务，持续强化对中资项目与人员的安全保障机制，也要将伊朗乱局视为长期的结构性风险，持续推进能源进口的多元化战略。

同时，中国须做好随时开展外交斡旋乃至参与冲突后重建工作的准备，延续自 2023 年以来推动沙特与伊朗关系缓和的成果，呼吁逊尼派国家保持战略克制、避免冲突升级，并通过联合国、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推动各方重返谈判轨道。

最后，在特朗普计划 3 月底访华、2026 年中美元首将多次举行会晤的背景下，中方更需防止伊朗问题过度外溢至中美关系整体议程，确保伊以冲突不会成为中美双边贸易、科技与战略对话的干扰项。

参考文献：

- [1] Hugo Lowell and Andrew Roth, "Inside Trump's decision to attack Iran: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The Guardian, 28 Feb 2026.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6/feb/28/trump-attack-iran-opportunity>.
- [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 [3] Suzanne Maloney, "After Khamenei: Planning for Iran's Leadership Transition",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Feb 2026. <https://www.cfr.org/reports/leadership-transition-in-iran>.

[4] 《若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亚洲国家将受最大影响》，联合早报，2025 年 6 月 23 日。
<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world/story20250623-6956686>.

[5] "Oil and gas majors and traders suspend shipments via Hormuz, sources say", Reuters, Feb 28, 2026.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oil-gas-majors-traders-suspend-shipments-via-hormuz-us-attacks-iran-sources-say-2026-02-28/>.

[6] Shir Perets, "Saudi Arabia, Israel pushed Trump to strike Iran for weeks before Operation Epic Fury – report", The Jerusalem Post, March 1, 2026. <https://www.jpost.com/middle-east/iran-news/article-888328>.

本文 2026 年 3 月 3 日首发于 “IPP 评论”

【霍尔木兹危机与特朗普的美国新战略】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战略重心所在

Mehri Madarshahi (梅里·马达沙希)

IPP 荣誉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国际创意和可持续发展中心 (ICCSD) 顾问委员会成员

引言：碎片化世界秩序中的多层次战略体系

当前中东冲突，尤其是围绕伊朗、以色列、美国以及黎巴嫩等周边地区行为体不断演化的对抗，不能仅仅通过“局部升级”或“传统国家间战争”的分析框架得到充分理解。它同样也不能被简单视为对一个原本稳定的全球秩序所进行的一场被动“压力测试”。

本文认为，这场冲突实际上展开于一个多层次的战略体系之中，在这一体系内，地区战争、大国竞争与地缘经济重组彼此交织，并持续相互塑造。在这一框架下，中东不仅仅是一个动荡地区，更是一个多重战略项目相互汇聚的场域；多个行为体在军事、经济、技术与规范等不同维度上，围绕部分彼此竞争的目标持续展开博弈。

除直接的战场结果外，这场冲突至少还体现出四种彼此交互的战略逻辑：

- (1) 围绕能源体系与战略资源的影响力整合与争夺；
- (2) 对不断演进的军事技术——包括精确打击体系和非对称作战体系——进行实战测试与能力展示；
- (3) 有关领土主权与军事干预的法律和规范约束，正在逐步被侵蚀并被重新界定；
- (4) 在一个日益由碎片化而非凝聚力所塑造的更广泛全球秩序之中，围绕地区阵营的竞争正变得更加突出。

在这一结构之下，这场冲突并不体现某一种单一的战略设计，也不体现某一种统一的霸权蓝图。相反，它反映出多种权力理性同时发生互动，这些理性分别作用于体系的不同层级，并产生远远超出该地区本身的累积性影响。

其结果是，全球所处的环境中，冷战后的秩序既未得到完整保留，也未被一种清晰的新秩序所取代。取而代之而浮现的，是一个碎片化的“中间时期”，其特征是：霸权模式并不完整，治理逻辑彼此竞争，军事能力、经济影响力与被感知的战略可靠性之间的分化不断扩大。

近期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判断。在持续升级的局势之下出现了 2026 年 4 月 11 日的高级别谈判，随后谈判迅速破裂，并立即重新回到包括对关键能源咽喉通道发出威胁在内的破坏性行动（2026 年 4 月 13 日），这表明，外交本身正日益嵌入冲突动态之中，而不再作为一种外部的稳定机制发挥作用。在这一语境下，谈判与其说是通向解决的路径，不如说是更广泛战略序列中的一种战术工具，这也进一步凸显了当代冲突所具有的多层次和非线性特征。

碎片化体系中的权力角色互动

这场正在展开的冲突，并不是由某一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塑造或任何一种稳定的国家等级制度所主导。相反，它揭示出一个体系，其主要行为体所施加的影响都是局部且往往彼此矛盾的：拥有军事力量，却缺乏经济控制力；具备经济中信地位，却缺乏安全承诺；政治姿态鲜明，却缺乏实际操作杠杆。

由此浮现出来的并不是一种协调有序的秩序，而是一个持续互动的场域：其中，一方行为体的每一步行动，都会重塑其他行为体所面临的约束与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碎片化并不仅仅是一种预先存在的状态，其本身就是这些互动作用的产物。

在升级态势的中心位置，美国和以色列仍然保持着明确的军事优势和行动主动权。它们通过力量投送、威慑以及定点打击，力图遏制伊朗并维持其地区主导地位。然而，这种军事优势并不能转化为体系性控制。每一次升级都会带来迅速超出战场范围的后果，扰乱能源市场，动摇盟友，并加深外交裂痕。

这种军事控制与系统性后果之间的脱节，在外交领域正变得愈发明显。即便在局势持续升级之际仍在进行的高级别谈判，也已不再发挥通向真正解决的路径作用。相反，它们更像是战略性间歇：是发出信号、重新调整位置或暂时停顿的时刻，而非能够调和那些根本相悖目标的机制。

当升级态势触及全球经济的基础设施时，其更深层次的意义便会充分显现出来。霍尔木兹海峡的不稳定，使一场地区性对抗转化为一场全球经济事件。这条狭窄的海上通道并不仅仅是一条运输路线；它还是一个结构性节点，世界能源供应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正是经由此处流动。一旦它变得不稳定，其影响便是立竿见影且波及深远的。

在这一背景下，权力已不仅仅通过军事力量来施加，它同样体现在扰乱流通的能力之中：转移风险、抬高成本，并将不稳定性跨境传导。伊朗尽管在军事上相对处于劣势，却恰恰展现出了这种能力。

伊朗：非对称性力量、战略杠杆与破坏逻辑

如果说美国代表的是技术优势，以色列代表的是精确威慑，那么伊朗所代表的则是另一种战争模式：非对称的、经济性的和体系性的。

伊朗的战略并不是为了在一场针对军事上更强大力量的常规战争中取胜。它围绕着一个更具可实现性的目标展开：把冲突成本提高到其对手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无法承受的程度。

从防御走向非对称进攻

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自 2025 年至 2026 年局势升级以来，伊朗已从一种以防御为主的姿态，转向更具主动性的非对称作战理论。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大规模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在整个地区部署代理人网络及合作性力量网络；

将打击目标从单纯的军事资产扩大到经济与民用基础设施。

伊朗并未试图完全阻止来袭打击，而是着重于在承受破坏的同时保全报复能力，这种策略可被称为“非对称韧性”。这使其能够在持续高压下维持行动能力，并确保局势始终保留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战略重心

伊朗最强大的资产，是其地理位置。伊朗位处霍尔木兹海峡沿线，这使其具备将一场地区战争转化为全球经济危机的能力。伊朗并未谋求彻底封锁海峡，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有效的策略：选择性扰乱。

这包括：

布设水雷行动；

使用无人机和快艇发动袭扰；

对商业航运实施骚扰与干扰。

其目的并非实行全面封锁，而是制造一种经过校准的不确定性：足以推高价格、扰乱供应链，并迫使全球予以关注。这由此形成了一种根本性的战略不对称。伊朗并不需要在军事上击败美国；它所需要的，只是扰乱全球经济。

经济战作为“拉平差距”的手段

因此，伊朗已将战场从领土范围扩展到了全球市场。对海湾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和海上航线的扰动，会通过通货膨胀、贸易、保险、航运以及金融稳定等领域产生连锁反应。

这也正是伊朗战略尤为有效之处。它能够：

将压力转嫁给依赖进口的经济体；

分化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应对；

对远在该地区之外的行为体形成间接杠杆。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朗并不只是在打一场战争。它是在将相互依存武器化。其战略并不依赖于战场主导地位，而是依赖于其在能源市场、供应链和通胀动态等方面放大体系性压力的能力。其结果是，一种不再受地理范围所限、而是以结构性方式分布于全球体系之中的升级形态。

一种以生存而非胜利为目标的战略

尽管拥有上述优势，伊朗仍面临严峻制约：经济脆弱、制裁压力、内部政治紧张，以及部分地区影响力网络的弱化。即便如此，它也展现出相当的韧性。即使在屡遭打击之后，其海上力量和非对称作战能力中的关键部分仍然保持完好。

这进一步印证了一个关键判断：伊朗的目标是战略生存与持续性扰乱的结合。随着传统能源通道趋于不稳定，全球市场也开始重新配置。替代性供应方，尤其是俄罗斯，因而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战略分量。由于其出口通道较少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再加上美国解除对俄制裁，俄罗斯能够提供一种在危机时期愈发稀缺的东西：相对可靠性。这里的悖论十分清楚：一场本意在于削弱某一行为体的冲突，最终却强化了其他行为体，而这种强化并非通过结盟实现，而是通过经济机会在非预期中的再分配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不仅会摧毁，也会重新分配。

与此同时，中国处于一种更为模糊的地位。作为深度嵌入全球贸易体系、且依赖中东能源流动的大国，中国在结构上直接暴露于这场危机之中。然而，它仍然避免将这种暴露转化为直接的安全介入。其应对依旧审慎，强调稳定与对话，同时依赖间接性的影响渠道。

这种策略或许能够带来短期灵活性，但也引出了一个更长远的问题：一个在全球经济网络中占据如此核心位置的大国，如果在地缘政治风险急剧上升的时刻选择缺席，它还能否保持战略可信度？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选择性介入，可能会削弱那些面临安全威胁、却得不到相应保障的伙伴对其的信心。

以色列：战术优势与战略模糊性

以色列在塑造这场冲突的军事节奏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其所处位置始终带有一种持续存在的张力：一方面是战术上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是战略上的不确定性。

战略目标：削弱，而非占领

以色列的核心目标通常并不是领土征服，而是能力削弱。这包括：

削弱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基础设施；

延缓或削弱伊朗与核相关的能力；

降低地区代理人网络的实际作战效能。

这种做法反映了以色列长期以来的一项战略原则：防止对手在战略能力上接近均势，尤其是在导弹能力和核潜力方面。

空袭行动已造成严重破坏。然而，伊朗似乎仍保有相当程度的残余能力，尤其是在导弹力量方面。这凸显出一个结构性限制：空中力量可以削弱深嵌式基础设施，但很难将其彻底清除。

升级逻辑与战略风险

以色列的战略同样包含升级管理这一层面。它试图通过提高冲突烈度，改变既有战略方程，迫使对手作出代价高昂的回应，或陷入误判。

然而，升级本身也伴随着风险：

在持续作战中对美国形成更深程度的依赖；

引发地区外溢；

一旦行动进一步扩大，国际政治成本也将不断上升。

其中的悖论十分明显：以色列在战术层面优势清晰，但其长期战略结果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拦截困境

以色列的一项关键脆弱性，体现在拦截的经济性上。伊朗使用相对低成本的无人机和导弹，迫使以色列动用价格高昂的拦截系统。久而久之，这就形成了一种不利的交换比率：进攻方付出较少，防御方却要承担高得多的成本。

如果这种模式持续下去，即便是技术先进的军队，也会承受显著压力。简言之，以色列在战术上是有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能够取得战略主导地位。

欧洲：从战略震荡到战略重估

在这场战争中，欧洲及其他次级行为体所扮演的角色受到更大限制。这些行为体并不塑造冲突的发展轨迹；它们所承受的是冲突带来的后果。能源价格波动、供应中断和通货膨胀，将外部冲击转化为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压力。即便是加强战略自主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被动反应，其驱动力不是去主导不稳定，而是去应对不稳定。

这场冲突进一步激化了一场已酝酿多年的争论：欧洲对外部安全保障的依赖，以及其自主行动能力的有限性。

欧洲安全框架仍然锚定于北约，并由此延伸至美国。然而，这场冲突的早期阶段暴露出欧洲各国政府对升级决策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外界对于其依赖性以及能动性减弱的担忧。

因此，“战略自主”这一理念已不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开始切实进入具体政策讨论，议题包括：

- 重建欧洲的国防工业基础；
- 储备弹药和关键零部件；
- 降低对非欧洲供应商提供关键军事技术的依赖；
- 提升联合采购与快速反应能力。

这一讨论并非抽象空泛。它直接关系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带来的教训；这场战争暴露出欧洲在军事准备方面存在严重的弹药短缺和深层次的工业能力不足。

在这场不断演进的讨论中，法国占据着尤为突出的地位。作为欧盟中唯一拥有独立核威慑力量的成员国，法国日益被视为不是集体防务的替代者，而是一个更具自主性的欧洲安全框架的潜在支柱。

全球南方：影响不止于能源

这场战争对全球南方的冲击，远远超出了能源价格层面。冲突加剧了全球粮食体系原有的脆弱性。非洲、中东和南亚的许多国家，仍然高度依赖进口化肥，尤其是氮肥产品。航运线路受扰、能源价格上涨以及与制裁相关的摩擦，都推高了化肥成本。

由于化肥生产本身高度依赖能源，特别是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其生产成本会直接受到能源价格上升的传导影响，并进一步推高粮食生产成本。其结果是：

- 粮食价格上涨；
- 粮食进口国面临更大压力；
- 脆弱地区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

因此，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不得不同时承受能源、粮食和物流成本的多重冲击，使其成为这场冲突中在结构上暴露程度最高、受损最深的一类输家。

战争战略、能力约束，以及正在浮现的赢家与输家

这场冲突并不只是海湾地区的一场区域性军事对抗。它同时也是一场具有启示意义的检验，检验大国如何发动战争、如何管理资源，以及如何为更长期的竞争进行布局。这里关注的是实践层面的问题：谁在做什么，使用了哪些工具，以及由此谁受益、谁受损。

美国：受制约的高强度战争

美国仍然凭借航母打击群、远程空中力量以及精确制导弹药，持续投射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这种作战主导地位，从冲突一开始便已清晰可见。

然而，这种战争模式也暴露出一种日益加剧的张力。美国虽然能够迅速投送压倒性的力量，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维持这种强度则更加困难。精确制导弹药、拦截导弹以及先进空射系统的快速消耗，暴露出其在库存深度和生产能力方面的脆弱性。

这一挑战并不仅仅是财政问题，更是工业问题。国防供应链依赖专用零部件、熟练劳动力以及复杂制造流程，而这些都无法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因此，关键系统的补充周期可能需要以“年”而非“月”来计算。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维度，是军事行动与美国国防工业基础之间的关系。这场冲突中所动用的诸多武器系统，主要来自既有库存，以及原本部署于欧洲或其他战区的资源。它们的投入使用，会进一步加快替换与现代化升级的需求。这种补充循环支撑着国防生产，带动工业活动，并维持就业。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战争不仅关乎“能否作战”，也关乎“能否在时间推移中持续维持并再生战力”。

与此同时，美国也存在能力短板。其中一个例子是反水雷能力。在霍尔木兹海峡这类狭窄海上咽喉要道中，这种能力至关重要。而相关资产的相对稀缺，恰恰凸显出高端力量投送能力与实际作战适应能力之间存在失衡。

综合来看，这些动态表明，尽管美国依然保持着无可匹敌的军事投射范围，但其在长期冲突情境下的可持续性正越来越受到审视，尤其是在未来可能与中国或其他竞争对手发生对抗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俄罗斯：通过扰动实现战略机会主义

对俄罗斯而言，这场冲突与其说是一个直接军事介入的战场，不如说是一个获取间接战略收益的机会。由于已深度卷入乌克兰战事，莫斯科总体上采取了一种借势获利的姿态。

能源价格上涨、市场波动加剧以及全球能源流向的重新调整，都对俄罗斯有利。更高的油气收入有助于对冲乌克兰战争带来的成本压力，而西方注意力的转移，也减轻了俄罗斯周边直接战略环境所承受的外部压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的姿态可以概括为：借由体系性分散注意力而实现被动获益。

中国：谨慎布局与经济收益

中国的处境则有所不同。北京避免直接军事介入，同时将自身定位为一个审慎的稳定维护者和经济受益者。

其核心利益主要在于能源安全与贸易连续性。海湾局势的不稳定，提升了替代性供应安排、折价能源获取以及物流网络多元化的价值。与此同时，这场冲突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观察美国军事承压、供应链脆弱性以及联盟行为模式的机会，而这些经验对于未来印太地区的情境具有高度相关性。

中国的优势，相比于高调介入，更集中于战略耐心与有选择性的经济获益。

联盟裂痕与欧洲缺位

这场冲突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是西方阵营缺乏凝聚性的协调，尤其是在欧洲内部表现得更为明显。若干欧洲国家并未真正参与早期战略决策，因此对相关政策的政治认同有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仅提供审慎或不情愿的支持。这与以往一些跨大西洋协调看起来更为稳固的危机形成鲜明对比。

随着局势演进，尤其是欧盟，愈发像一个旁观者，而非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行为体。这进一步强化了欧洲内部原已存在的一场辩论：是否需要更大程度的战略自主。

在这一背景下，法国的重要性再次上升。其核威慑力量正越来越多地被讨论为未来欧洲安全架构中的一个潜在支柱。尽管更广泛的“欧洲核保护伞”设想在政治上仍然敏感，但它已不再只是停留在理论讨论之中。

冲突经济中的赢家

除直接卷入敌对行动的国家之外，这场冲突还催生出一批相对明确的经济受益者。

其中包括：

能源生产国，它们受益于价格上涨和市场趋紧；

俄罗斯，其收益来自油气收入增加以及能源流向重组；

中国，其可能获得更有利的能源安排和更大的贸易杠杆；

保险与航运企业，它们从更高保费和风险定价中获利；

国防工业，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军工产业，它们受益于对武器、弹药、拦截系统以及补充更新周期的持续需求。

输家与结构性成本

在主要输家之中，其所承受的成本同样不容忽视：

美国，面临不断加剧的资源压力、持续上升的作战成本以及过度扩张的风险；

欧盟，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经济上高度暴露，且内部意见分裂；

地区稳定本身，因海湾国家正面对更强烈的不安全感与不确定性；

全球南方，在那里，能源、化肥、运输和粮食成本的上升，不成比例地冲击着本已脆弱、依赖进口的经济体。

初步教训与正在显现的方向

从这场冲突中，已经可以总结出若干初步教训。

第一，在现代战争中，可持续性与能力本身同样重要。

第二，工业能力如今已是一种战略资产，而不再只是背景条件。

第三，联盟不仅需要军事上的协调一致，也需要政治上的包容与参与。

第四，在塑造冲突结果方面，经济行为体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军事行为体。

第五，非对称战争有可能通过更为复杂、更具总体性的战略取得胜势。

对欧洲来说，这些教训正日益沉淀为一套新的战略表述：自力更生、战略自主和防务一体化。尽管这些表述能否最终落实为具体政策仍存不确定性，但相关讨论的总体走向已十分清晰。

结论：一场没有胜者的冲突，一个失去锚点的体系

这里所考察的这场冲突，并未走向决定性的军事胜利，也没有带来清晰的权力再分配。相反，它揭示出国际政治中一种更深层的结构性现实：单一权力组织中心正在被侵蚀，而稳定的替代性安排却并未出现。

那种认为压倒性的军事能力能够带来决定性结果的传统假设，已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尽管美国拥有技术优势，但它在工业产能、库存补充以及政治承载力方面正面临日益增大的约束。这些限制并不以任何简单意义上的方式构成衰落，但它们的确削弱了这样一种假设：在持久、跨战区冲突的时代，单靠军事力量就能够确保政治结果。

对以色列而言，这场战争表明，战术上的成功在实现战略性解决方面是有其限度的。其作战能力依然强大，但更广泛的目标——永久性削弱伊朗的能力——仍然难以实现。伊朗导弹力量和非对称作战资产的持续存在，指向了现代冲突中的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技术上占优的行为体能够施加代价，但往往难以施加终局。

伊朗则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尽管遭受了重大打击，它仍保有通过扰乱能源市场和制造地区不稳定、在其疆域之外施加代价的能力。这并不等同于胜利，但确实构成了一种战略杠杆。伊朗既非明确的赢家，也不是被击败的力量，而是一个持续性的扰动者，能够在其常规军事实力之外影响局势走向。

与此同时，欧洲呈现出来的并不是一个核心行为体，而是一个受到限制的行为体。这场冲突强化了人们长期以来对战略依赖和决策碎片化的担忧。围绕战略自主的新一轮讨论，以及法国作为潜在安全支点所受到的日益关注，反映出各方对依赖外部安全保障日益增长的不安。然而，制度、政治和战略层面的分歧，仍在继续限制欧洲采取协调一致行动的能力。

除直接参战方之外，这场冲突还产生了显著的次生效应。能源生产国、国防工业以及与风险相关的金融部门从这种扰动中获益，而全球南方则因能源价格上涨、粮食成本上升以及经济脆弱性加剧而承担了不成比例的代价。这种不对称性揭示了国际体系中权力与风险分布的不均衡。

综合来看，这些动态指向了一场更广泛的转型。这场冲突并未开启一种新的稳定秩序，而是加速了一个本已展开的过渡进程：国际体系正从单极格局走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竞争性更强的局面。然而，碎片化并不会自动带来均衡。更常见的情况是，它会催生彼此交叠的竞争地带、不断变动的结盟关系，以及不稳定的威慑格局。

在缺乏一个能够强制维持秩序的主导性霸权力量的情况下，未来可能出现几种不同的演变路径。

其一，是进一步的碎片化，其特征是相互竞争的势力范围、经济脱钩以及多边机构作用的削弱。在这样的世界中，权力将变得更加地方化，而合作也会愈发呈现交易性特征。

其二，是区域秩序的巩固，即各地区强国在自身势力范围内承担更多安全与治理责任。这可能提升区域自主性，但也可能加剧区域之间的竞争。

其三，则是中等强国之间联盟的渐进形成。那些既非超级大国、也非边缘小国的国家，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围绕安全、经济韧性和技术治理展开协调，通过构建灵活的对齐关系来共同管理风险。这类联盟不会取代现有制度，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侵蚀所造成的缺口。

就目前而言，这几种路径都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国际体系仍处于流动状态，其运行特征表现为局部性的对齐、间歇性的合作，以及反复出现的不稳定。因此，这里所讨论的这场冲突，并不只是一次地区危机。它更是世界秩序更广泛转型的一种体现：在这一转型中，权力更加分散，权威更具争议，结果也更难预测。这个新兴时代最鲜明的特征，不是任何单一行为体的支配地位，而恰恰是不确定性本身的持续存在。

本文 2026 年 4 月 16 日首发于“IPP 评论”

【霍尔木兹危机与特朗普的美国新战略】

从劳合社到 DFC，霍尔木兹危机背后隐秘的金融较量

廖凯

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IPP 访问学者

2 月 28 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不足 48 小时，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过境量骤降 81%，从 1 月的平均每日 1030 万载重吨，降至 3 月 1 日只略高于 100 万载重吨。到 3 月 4 日上午，大型油轮过境活动“实际上为零”，只剩少量小型船舶和本地沿岸交通。

最初造成商业航运停滞的，并非伊朗在航道内布雷或实施物理封锁，而是 Gard、Skuld、NorthStandard 等主要船东责任保险协会（P&I Clubs）成员相继发出 72 小时战争险取消通知，将伊朗水域、波斯湾及相邻水域排除在战争风险保障之外。由此，霍尔木兹海峡在被完全物理封锁之前，已经先在金融和保险意义上被“事实关闭”。

现代商业航运依赖船体与机械险（H&M）、船东责任险（P&I）和货物险共同构成的信用链条。银行不会为缺乏保险的船舶和货物提供融资或信用证，货主不会把高价值货物交给无赔付保障的船舶，船东也无法独自承担船舶损毁、人员伤亡、油污清理和第三方索赔等巨额责任。因此，保险不是航运的附属品，而是船舶进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制度门槛。只要战争险和 P&I 保障断裂，即使海峡没有被物理封锁，商业航运也会自动收缩。这正是本次危机的战略意义。

本文认为，这场保险危机并非偶发的市场失灵，而是“美国优先”政策在盟友关系、情报共享和金融权力三个层面叠加作用的结果：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与公开表态动摇了英美情报共享的预期稳定性，使伦敦市场的信息可见性受到质疑。而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位于伦敦的全球性保险与再保险市场）战争险体系，又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英美安全合作提供的信息生态。一旦这一前提受到质疑，承保人便可能从“提价承保”转向“取消或暂停报价”。美国随后以 DFC 为主体推出 400 亿美元美国主导的再保险机制，则进一步显示其试图借危机将海上战争险的部分定价权从伦敦金融城转向华盛顿。

一、劳合社：战争险的定价中枢

要理解这场保险危机的结构性根源，须先理解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它不是一家普通保险公司，而是三百余年来将战争风险转化为可定价金融产品的市场平台，也是战争险定价的中枢。

（一）从咖啡馆到全球市场平台

劳合社的历史始于 1688 年伦敦塔街的爱德华·劳埃德（Edward Lloyd）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因聚集船主、商人和水手，成为海运情报的自发交换中心。劳埃德雇人从码头取回最新船讯，并于 1734 年创办了《劳合社名录》（Lloyd's List）。这份出版物延续至今，是全球最古老的持续出版期刊之一，也是航运情报的权威来源。

今天的劳合社是一个保险市场平台，结构类似证券交易所。它提供规则、资本监管框架、品牌信誉和交易场所，真正承担风险的是内部独立运作的承保辛迪加（syndicate）。每张保单并非由劳合社统一承保，而是在劳合社市场上由不同辛迪加按比例分担，形成“联合认缴”（subscription）机制。

围绕辛迪加运作的，还有管理代理人、经纪人、再保险人、P&I 俱乐部和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共同构成高度专业化的风险分散生态系统。劳合社是全球最大的专业保险市场之一，其 2025 年总承保保费达到 579 亿英镑，控制约 45% 的特殊险市场。

（二）联合战争委员会的风险协调机制

联合战争委员会（Joint War Committee，下称“JWC”）是覆盖整个伦敦海上保险市场的战争风险协调机制。该委员会由劳合社与国际保险承保人协会共同组成，汇集了来自劳合社辛迪加与伦敦公司市场的高级承保人，是整个伦敦市场在战争风险问题上形成集体判断的制度接口。

JWC 通常委托独立安全顾问评估地缘政治风险，并发布“高风险区域清单”（Listed Areas）。一旦某海域被列入该清单，进入相关区域的船舶在融资、租船及保险实践中通常需要补充或扩大战争险覆盖，各承保主体随即据此信号自主调整费率与承保条件。

换言之，JWC 本身并不直接承保，也不具备法律强制力，但其风险认定在市场中具有事实上的标准效力，往往成为触发整个海上战争险重新定价的关键节点。伊朗战争爆发后，JWC 迅速将拥有美军基地的海湾国家（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等）纳入高风险区域清单，理由是这些地区可能成为伊朗打击目标，局势“高度不可预测”。清单一经发布，市场集体跟进，这正是 JWC 作为制度接口的实际效力所在。

（三）私营情报网络与官方体系嵌合

劳合社数百年来形成的定价能力，不仅依赖资本规模与承保经验，更依赖支撑 JWC 判断的底层信息机制——私营情报网络、英国官方海事安全体系与盟友情报环境三者的嵌合。

首先，伦敦市场自身拥有高度发达的私营情报网络。它整合经纪人与船东的即时反馈、自动识别系统（AIS）船舶轨迹、港口代理与船长报告、海事安全公司评估、独立风险顾问意见、卫星与开源情报，以及历史索赔数据，并通过伦敦金融城高度集中的专业市场，将这些信息快速转化为费率、条款、免责条款和追加保费。

伦敦麦吉尔·帕特纳斯经纪公司（McGill & Partners）海上保险负责人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坦言：“伦敦海上战争险行业内部存在一套高度相互关联的情报网络，我认为这种网络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但伦敦市场的私营情报网络并不是孤立运行的。战争险定价涉及导弹部署、无人机活动、海军行动、护航安排、港口安全和交战方意图等高度敏感信息，仅靠船东、经纪人、AIS 轨迹、港口报告和商业情报公司并不足以作出完整判断，因此必须依托英国官方海事安全体系提供的上游信息环境。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中心（UKMTO）正是英国海军体系与商业航运之间的重要接口，它长期向船员、航运公司和地区当局提供经过核实和佐证的安全信息，并鼓励船舶在其自愿报告区域内提交日报和异常情况报告。

这些信息有助于承保人判断某一袭击是真实军事升级、局部事件还是心理战，并据此调整战争险费率、免责条款和承保范围。这种商业情报与官方安全体系的合作并非近年才出现。一战期间，英国皇家海军就曾直接使用劳合社的信号站追踪全球船舶动向，并掌握从中立国驶往欧洲大陆的船舶货物信息。这说明，劳合社的商业情报价值早已被国家安全体系纳入利用，二者之间的关系有长期历史积淀。

在英国官方海事安全体系背后，还存在更高层级的盟友情报环境。五眼联盟并不会公开、直接地为劳合社某一张保单提供情报，但它长期支撑英国对海上威胁、导弹部署、舰艇活动和区域军事风险的判断。伦敦保险市场则通过英国政府、皇家海军、UKMTO、商业海事安全公司、经纪人网络和独立顾问，间接受益于这一信息环境，并将其转化为风险模型、承保判断和价格信号。伦敦的定价能力，部分来自对地缘政治危险的特殊可见性。这种关系很少公开展现，但它真实存在。

正如美国海事权威人士约翰·康拉德（John Konrad）指出：“伦敦之所以能在失去大量航运子市场的情况下仍牢牢掌控全球保险定价权，答案在于更好的情报。”

因此，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的外交摩擦以及情报优先事项变化，即使未必已经导致正式的情报共享降级，也会改变市场对“信息可见性”的预期。对于战争险市场而言，关键不只是风险本身有多高，而是承保人是否相信自己能够理解风险。若承保人认为自己仍能获得足够信息，就会倾向于通过提高保费、缩短期限和增加免责条款继续承保；一旦他们认为风险变得不可见、不透明，就可能选择拒绝报价或取消承保。也就是说，在海上战争险市场中，情报预期的动摇本身就会转化为定价和承保行为的变化。

二、盟友关系裂变与市场信心崩塌

战争险市场并不天然害怕战争，战争本来就是其承保对象。在过去三百年的战争、海盗事件和各种危机中，劳合社的常规反应是提高保费、缩短保险期、增加免责条款，从高风险中获取高收益。正是凭借这种“危险可定价”的能力，伦敦逐步成为全球海上战争险的中枢。

那么，这次为何不同？

问题在于不确定性升高。战争险定价的前提，是承保人能够判断风险边界——谁是打击目标、袭击有何规律、护航安排是否可靠等。这套判断能力长期依赖一个隐性前提：伦敦承保人能够通过英美安全合作、五眼情报生态和长期同盟信任，间接获取美国主导的海上安全体系中的关键信息。

“美国优先”动摇的，正是这个隐性前提。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Jamieson Greer）在达沃斯将“美国优先”解释为“汉密尔顿主义”的回归，主张通过关税和产业政策重建本国产业能力；白宫经

济顾问米兰（Stephen Ira Miran）则进一步把安全保护伞、美元和情报界定为美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认为盟友长期受益却分担不足，应当重新承担成本。这一框架的关键含义是：安全、情报和市场准入不再是美国无条件提供的免费品，而是可以被重新定价，乃至作为谈判筹码使用的战略资源。

这种逻辑已在单边关税、未协调盟友便发动战争、对英国施压并威胁重谈贸易协议等政策中显现。本次危机中，英国既未参与初期战争行动规划，也未立即授权美军使用英国基地，所谓“特殊关系”已出现裂痕。对战争险承保人而言，关键在于市场是否开始怀疑信息不再完整、军事保护不再无条件。一旦这种预期形成，承保人便会从“提价承保”转向“暂停报价”或“拒绝承保”，因为当风险无法被量化时，市场宁愿退出。

正因伦敦市场收缩源于同盟、情报与安全预期的动摇，美国才获得介入空间。DFC 机制的迅速推出，也显示其更像是借市场空窗有备而来，而非单纯临时救火。

三、DFC 切入：从救市到抢市

在劳合社市场信心动摇的窗口期，美国以罕见的速度完成了战略介入。

3 月 3 日，特朗普下令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为所有过境波斯湾的海上贸易提供政治风险保险；

3 月 6 日，DFC 正式宣布建立约 200 亿美元的滚动再保险机制；

3 月 11 日，安达（Chubb）被确定为首席承保商；

3 月 20 日，承保范围扩展至责任险（War P&I）；

4 月初，Travelers、Liberty Mutual、伯克希尔·哈撒韦、AIG 等六家美国保险公司相继加入，总规模扩容至 400 亿美元。

这一介入已超出短期危机管控。DFC 本身就是服务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金融工具。此次机制又以美国政府财政承诺为后盾，由财政部参与推进，并与美国中央司令部协调安全信息，由美国头部保险公司参与。因此，它实质上是基于“美国优先”的国家化再保险机制，意在切入原本由伦敦劳合社市场主导的海上战争险领域。多家伦敦媒体随即警告：若此类机制制度化，海上金融中心的重心可能从伦敦转移至华盛顿。

此外，DFC 机制最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其对申请船舶提出的资格审查要求。申请方须提供船名、IMO 编号、运营方、船旗、船员信息、受益所有人、注册船东、货物来源与目的地、货物所有人，以及船舶融资方等详细信息，并由 DFC 及跨部门伙伴进行制裁筛查（sanctions screening）和“了解你的客户”（KYC）审查。这意味着，每一艘进入这套机制的船舶，都将接受美国政府的制度性信息审查。保险入口由此变成了信息采集机制。

正如《金融时报》首席商业专栏作家约翰·加珀（John Gapper）指出：“如果美国关于船舶动向和危险的军事情报只被筛选后提供给特朗普选定的保险供应商，那么特朗普可能会给劳合社制造更大的麻烦。伦敦的战争险承保人依赖私营情报网络来获取信息。若美国保险公司既拥有更高等级的海事情报，又获得官方背书，伦敦市场将很难与之竞争。”

四、对中国的影响和机会

（一）筛查门槛与天价保费

DFC 机制的地缘政治筛选逻辑，对中国影响尤为直接。美国参议员珍妮·沙欣（Jeanne Shaheen）在致 DFC 的公开信中指出，DFC 拟支持的能源出口对象并不清晰，并追问其是否会承保运往中国的能源出口，因为中国是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的最大目的地。她进一步警告，如果 DFC 机制意在支持所有能源出口以压低美国和全球能源价格，那么“北京将成为这一方案最大的直接受益者”。

这实际上点破了 DFC 机制的战略悖论：若全面覆盖中国相关航运，政治上难以接受。若通过 KYC、制裁筛查、保费定价和船货资格审查将中国关联船舶排除或边缘化，DFC 便不再只是危机救市工具，而可能沦为美国在关键海上通道上对中国能源运输链条“卡脖子”的战略工具。

（二）资本流动的结构重组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海上保险可能从风险定价工具，转化为美国重塑航运合规秩序的入口。劳合社长期在战争险、能源险和政治风险险领域发挥全球定价基准作用，其费率和承保意愿本身，就是市场风险判断的重要信号。

若 DFC 机制从危机应急走向常态，美国主权再保险便可能成为海事战争险的新型背书，使亚洲航运融资银行、贸易融资方和大宗商品贸易商在高风险航道上，更多考虑美国设定的保险资格、制裁筛查和 KYC 标准。这虽不等同于正式制裁，却可能形成隐性门槛，影响船东的船旗选择、融资安排和货物承运，也影响银行开立信用证时对保险资格、货物来源和受益所有人的审查。

（三）压力与机遇并存的战略窗口

如果说 DFC 机制对中国构成直接压力，那么“美国优先”系统性损害盟友利益这件事，却在另一个维度为我国打开了战略窗口。

单边关税冲击盟友出口、伊朗战争绕开盟友单边行动，甚至将马岛主权问题作为对英施压的筹码，美国正在把最亲密的盟友推入不得不重新计算对美依赖成本的处境。当英国、欧盟乃至更多国家开始质疑美国主导的保险、清算和融资体系的可靠性，它们就有了更强的动机寻找替代性安排。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融资、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在航运保险领域建立独立定价能力，这些过去被许多国家视为政治敏感的选项，正因美国单边主义的扩张而变得更具现实吸引力。受损于美国政策的国家未必会全面倒向中国，但它们在参与中国主导的区域性金融和贸易安排时，政治阻力将明显降低。

霍尔木兹危机同时也为我国提供了发展自主金融基础设施的历史契机。这场危机清楚显示，谁掌握关键航道的保险定价权，谁就掌握贸易通道的实际准入权。

我国目前在航运保险、再保险和海事风险定价领域仍高度依赖伦敦市场和西方 P&I 体系，这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脆弱性。DFC 的介入提示了一条可行路径：我们可发挥海南自贸港，特别是“中国洋浦港”在船籍登记、航运金融、保税燃油、船舶 SPV 和海事服务上的制度空间，逐步建立国家背

书的航运保险与再保险体系，推进航运融资和能源贸易人民币计价，并在国际海事金融规则制定中争取更大话语权。

本文 2026 年 4 月 29 日首发于“IPP 评论”

【霍尔木兹危机与特朗普的美国新战略】

特朗普访华之后，如何理解今天的中美关系？

导语：5月13日至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中美元首时隔九年再次在北京会晤。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就中美关系连续提出“三问”：即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他强调，“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在此次会晤中，中美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这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双边关系提供了方向性指引。中美双方还就一系列重点议题形成初步安排，并就重大敏感问题释放出继续沟通、管控风险的信号。日前，IPP多位专家围绕会晤释放的战略意涵、初步成果及后续影响作出观察和分析，并就中美关系的阶段性变化与长期走向展开研判。

中美关系：不以一时输赢论

郭海 IPP 执行院长、研究员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晤。从这次会晤的结果来看，双方达成了几项重要共识。

第一，双方初步达成“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至少在中短期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此次会晤中，中方再一次在台湾问题上划出了红线。特朗普起初对此表示，习主席在会晤中对此表明了态度，但他“没有评论”。但在5月15日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特朗普转而强调：“我不希望有人宣布独立。”总体而言，美方保持了较为谨慎的态度，没有改变既定的“一个中国”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尚未就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法案做出决定。特朗普面临的国内压力不小，国会两党议员都在敦促特朗普点头。“有钱不赚”也不符合特朗普一贯的重商主义风格。但特朗普很清楚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风险所在。他一方面还是会“把牌攥在手里”，而另一方面也会延续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既定政策。

第二，在伊朗问题上，尽管中美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形式的公开声明，但双方还是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共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意愿。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会晤期间放出消息，称中方同意其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必须重启的观点——这可能是有意在曲解中方的意思。长期以来，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是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而此次战争本就不应该发生。实际上，中方一直在支持巴基斯坦

给美国与伊朗提供外交斡旋，防止冲突升级。从中美双方在伊朗问题上的表述差异可以看出，华盛顿似乎急于塑造一种“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的国际印象。

第三，在贸易问题上，双方防止了“贸易战”的进一步升温，并且在部分领域实现了进展。例如，花旗集团将获中国第七张外商独资券商牌照，成为中国第七家外商独资券商；特朗普在返美途中表示，中方承诺采购 200 架波音公司飞机。虽然这些交易本属中美正常经贸往来的一部分，但在当前的中美关系大背景下，它们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表明中美经济关系不会“全面脱钩”，双方将继续维持“照常营业”（business as usual）的状态。在如今的外部环境下，能实现这种程度的正常国际贸易，实际上已属实不易。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的经济界而言，这次会晤都起到了“定心丸”、“压舱石”的作用。

有部分分析（包括许多西方媒体和学者）倾向于把中方视作此次会晤的“赢家”，而特朗普为“输家”。这种观点表面上看似有一定依据，但其实有失偏颇，不符合中美双边关系与国际政治的现实状况。尽管此次元首会晤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中美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双方互动本就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不可能以用一次会晤、一项表态或短期舆论风向来简单定义输赢。

大国交往注重的是博弈的长期性、稳定性以及风险的可控性。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元首会晤成功举办本身就是一项给当前失稳的世界秩序注入稳定的重大成果，中国、美国和国际社会都是此次会晤的“赢家”。

时隔 9 年再握手——大国的担当

杨丽君 IPP 资深研究员、教授

谈中美首脑会谈，离不开当前的世界局势。世界秩序正在迅速走向失控——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伊朗战争再起。俄乌战争的影响主要在欧洲，但伊朗战争的影响则是全球性的。

首先，全球石油价格飞涨，对全球经济和各国内政带来很大影响。

美国攻打伊朗由短期取得胜利转向长期对峙，伊朗借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通过控制石油来影响全球经济和各国内政。同时，伊朗战争也加剧了主要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分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近期就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由于该组织对成员国的原油输出价格具有重要影响力，高产能成员国阿联酋的退出，意味着未来石油价格有可能进一步高企。

其次，美国的同盟阵营正在呈现解体态势，各国从之前的对美军事依赖转向寻求“战略自主”。

在欧洲，英国拒绝美军使用本国基地来打击伊朗民用设施，德国仅同意“有限”使用。为了报复德国，近期美国五角大楼正式宣布未来将从德国撤出 5000 名美军。这些都意味着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美国军事同盟内部信赖关系出现严重裂痕。

在亚洲，日本政府借操纵台湾议题，渲染朝鲜和中国的军事扩张，来实现其修改宪法和再军事化的目的。大力发展军工防卫产业、通过向周边国家出售武器来拉动国内经济成为日本政府目前正在推进的国策。为武器出口松绑的“防卫三文书”修订应该没有什么悬念，高市早苗计划在 2027 年修改

宪法也在紧锣密鼓推进中。再加上其他区域冲突，如果局势不加以管控，失控的世界秩序必然会滑向战争。

中美两大国已经是“事实上的 G2”，即两国是“事实上的超级大国”。从世界秩序管控这个角度来看中美元首会谈，对会谈结果的理解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具体来讲，这次元首会谈的战略成果远较具体的经济成果更重要。这次会谈将中美关系定义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尽管中美之间依然存在分歧，竞争也不可避免，但稳定两国关系将是两国共同的目标。

稳定的中美关系是安定世界秩序的前提。在会谈中，中方领导人认为，中美两国可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两国在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稳定原油价格、妥善解决伊朗问题等方面达成一致，这些都说明了中美共同管控全球危机的一致性。

在经贸层面，美国希望中国对美开放市场，特别是科技和 AI 产业市场。也就是说，一部分非尖端和竞争不那么激烈的科技产品和技术会允许中国使用。这也意味着，中美两国的科技竞争依然会持续，甚至会更加白热化，只不过美国对中国的科技竞争转变了方式，从以前的全面封杀转变为令中国产生技术依赖，进而制约中国的自主研发能力。显然，在过去近十年的中美竞争中，美国的全面封杀不仅没能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反而激发出中国强劲的自主研发能力。反倒是，开放市场更多地意味着对美技术依赖。在电子科技领域，中国没有像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那样全面依靠美国技术，一个原因正是中国的市场保护。对此我们应当如何应对？需要思考。从科技竞争的角度看，未来的中美关系依然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中美共同意愿能否达成，依然存在着很多变数，但是这是作为两个超级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

特朗普访华：稳定预期与有限缓和

徐伟钧 IPP 副研究员

特朗普此次访华释放出的最重要信息，是为中美关系提供了稳定预期。双方并未宣布解决所有结构性矛盾，但通过元首会晤确认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框架。只要特朗普不出尔反尔，这一定位将有望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由此来看，此次访问的首要成果不在于某一项具体协议，而在于继续巩固了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引领作用，为中美避免滑向全面对抗创造了新的政治条件。

从经贸层面看，此次访问也为下一阶段的贸易谈判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中方的表述显示，双方经贸团队已形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并同意在经贸、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扩大交流合作。美方则更重视农产品、波音飞机、市场准入等可展示的交易成果。虽然这些成果仍有待工作层面继续细化，但它们至少说明，中美经贸关系正在从此前高度对抗的“关税战”逻辑，转向以阶段性谈判、议题清单和利益交换为特征的“管理型竞争”。这对于缓和市场预期、防止贸易摩擦突然失控，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访问透露出中美在重大风险议题上求同存异、共管风险的可能性。台湾问题仍是中方最关切的核心问题，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明确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问

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使双边关系陷入危险境地。特朗普虽然没有公开提及美国对台政策，也没有就是否“协防台湾”作出明确表态，但其保持战略模糊的决定，本身也反映出美方至少在当前阶段不愿让台湾问题破坏访华形成的缓和氛围。

在日本问题上，此次访华进一步放大了日方对尼克松式“越顶外交”的焦虑。日方曾试图推动特朗普访华前后顺道访问日本，但未能实现。特朗普虽在返程途中第一时间与高市早苗通话，但通话仅约 15 分钟，更像是事后安抚而非实质协调。这表明特朗普当前更重视维护中美互动的积极氛围，不愿让日本因素干扰中美关系阶段性修复。

此外，从中美会谈涉及中东、乌克兰、朝鲜半岛等议题来看，双方仍存在围绕地区热点进行危机沟通的空间。特别是在伊朗战事和霍尔木兹航道问题上，中美都不希望局势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冲击全球经济，因此存在有限协调的现实基础。不过，这种协调更可能是问题导向的、交易性的，而不是战略互信意义上的深度合作。

当然，此次访问的遗憾也十分明显。访问氛围良好，礼宾规格很高，双方领导人的互动也很积极，但并未发布联合公报或联合声明，也没有达成由两国元首直接签署的“大协议”。至少在公开层面上，此次访问没有形成共同事实清单，贸易、台湾、人工智能、伊朗等关键议题也没有取得突破性成果。这说明，中美关系的缓和仍主要停留在政治氛围和框架搭建层面，尚未真正转化为可以约束双方政策行为的制度性安排。

从后续安排来看，此次访问为未来进一步的谈判与协调预留了充足空间。特朗普已邀请习近平主席今年秋季回访美国，中美双方也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 G20 峰会。这意味着今年内中美元首存在至少三次线下会晤与当面沟通的契机。只要双方能够在关税、农产品、投资、技术管制、对台军售等问题上形成阶段性共识，未来仍有可能把此次访华的政治氛围转化为更具体的协议成果。

不过，中美关系向好的趋势仍然脆弱。特朗普面对中期选举压力，仍可能出于国内政治需要继续“打中国牌”，通过展示对华强硬来获取选民支持。特朗普回国后仍将面对通货膨胀、油价上涨和伊朗战事外溢等政治压力，这些因素都可能促使其重新诉诸对外强硬姿态以转移国内矛盾。

因此，此次访华可以被视为中美关系阶段性止跌企稳、缓和降温的重要节点，但不一定会推动两国关系形成长期稳定的结构性缓和趋势。

从关税休战到机制协商：中美经贸关系进入新阶段

刘佳 IPP 研究员

尽管近期中东局势升级、伊朗相关危机持续发酵，导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趋于紧张，但经贸议题仍然是此次中美会谈的核心。

美国总统特朗普率领多位美国工商界代表访华，显示美国商界希望推动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关键协议，并争取将于 11 月到期的关税休战安排进一步延长。当前摆上谈判桌的重要议题，包括波音飞机采购合作以及数十亿美元规模的大豆采购计划等。最终，双方共同确认，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

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这表明，中美关系有望从此前的阶段性缓和，逐步转向机制化协商与可控竞争并存的新阶段，并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双边关系稳定提供框架性指引。

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谈判成果，双方达成的主要共识包括：第一，继续落实前期磋商成果，并就相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第二，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产品降税等问题，并原则上同意对规模相当的彼此关注产品实施降税；第三，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第四，通过一定范围内产品的相互降税安排，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双向贸易；第五，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和零部件对华供应等事项达成相关安排，并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其中，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被视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成果之一。事实上，早在 2025 年，中美双方已经建立起财政部长—副总理层级的沟通机制，在缓解和管理双边经济紧张局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高层沟通渠道不仅有助于为两国领导人峰会做准备，也将在 2026 年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对维持双边关系稳定发挥关键作用。不过，仅依靠高层沟通机制仍然不足。鉴于中美经贸关系体量庞大、议题复杂，仅有领导层和高级官员对话，难以覆盖大量具体且长期存在的技术性问题。因此，还需要建立更加常态化、行政层级更低但持续有效的沟通机制，以形成多层级协调体系，才能更有效地管理全球最复杂、影响最大的双边经济关系之一。

与此同时，去年持续升级的关税摩擦也对美国农业造成了明显冲击，美国农民普遍希望扩大对华出口，包括大豆、牛肉和家禽等农产品。今年第一季度，中美贸易额同比下降 16.6%，降至 1286.8 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 966.9 亿美元，同比下降 16.3%；美国对中国出口 319.9 亿美元，同比下降 17.6%；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同比下降 15.5%，降至 646.9 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美之间的关税体系已不再是单一税率结构，而是由基础关税、“301 条款”加征关税，以及针对特定产品实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共同构成的复杂体系。2026 年 1 月，美国集中公布了一批针对中国产品的“双反”调查终裁结果，涉及农产品、化工、建材等多个领域，相关关税水平进一步提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 16.3%——高关税显著削弱了相关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因此，在当前中美关系出现阶段性缓和、并形成初步稳定态势的背景下，双方如果能够继续在关税问题上保持克制，并恢复多层级、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对于稳定双边经贸关系、降低摩擦升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特朗普访华与中美 AI “竞合”新格局

戴明洁 IPP 研究员

在此次特朗普访华事件中，我重点关注了人工智能（AI）这一中美战略竞争核心领域的动态与趋势。总体而言，这次访问预示着中美之间基于实力与差异的“竞合”新格局正在形成，未来的中美 AI 关系将呈现出一种“基于实力的竞争”与“基于差异的合作”并存的交织态势。

首先，元首外交与工商界参与体现出 AI 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性提升。此次访问中，大国 AI 治理与战略稳定成为国际社会期待中美达成共识的关键领域之一。在访华前，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专访时指出，中美在 AI 领域存在竞争是自然的，但应良性竞争，要通过合作共同展现大国担当。这一表态其实为双边 AI 互动指明了“管控竞争、探索合作”的方向。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随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团中，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的“压轴加入”成为焦点。这一戏剧性转折表明，即便在芯片出口管制下，美国也无法忽视与中国在 AI 产业层面保持对话通道的现实需求。

黄仁勋坦言，此行是“建立更好伙伴关系的绝佳机会”，而马斯克、库克等科技领袖对中国市场与创新能力的积极评价，共同释放出美国产业界对华合作与市场机遇的持续看重。工商界的深度参与，意味着 AI 不仅是国家间的战略博弈，更体现出中美是紧密交织的产业利益共同体。

其次，从“实力差距”到“路径差异”，中美 AI 发展生态越来越互补。当前，中美 AI 竞争已超越简单的“领先—追赶”叙事，日益呈现为发展理念与路径的深刻“差异”。

在技术侧，美国凭借其在高端芯片、核心算法上的先发优势，继续领跑前沿基础研究与通用人工智能（AGI）探索；中国则在工程化落地、中端芯片制造与算力高效调度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

在应用侧，差异更为显著。美国因“制造业空心化”缘故，AI 应用更多聚焦于代码生成、法律、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中国则依托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强力推进“人工智能+”行动，致力于让 AI 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

在国际合作方面，美国倾向于联合其高价值盟友，如欧洲、日韩等具有高价值市场的发达国家，以及拥有低廉能源和主权财富基金的海湾国家，走“精英路线”；中国则走“大众路线”，强调 AI 时代全球南方国家的均衡发展、包容普惠。

最后，中美 AI 之间的“差异”孕育“合作”，AI 全球治理与风险管控有望迎来国际共识。正是上述的结构性“差异”，而非单一维度的“差距”，为中美 AI 合作开辟了潜在空间。差异意味着双方并非在同一赛道上进行零和博弈，而是在不同维度上各具优势，存在功能互补的可能。例如，中国丰富的应用场景与数据资源，可为美国的前沿算法提供验证和优化的沃土；而美国的基础理论突破与技术生态，亦可为中国技术迭代提供参照。

更重要的是，面对 AI 技术带来的共同挑战——如自主武器系统风险、深度伪造治理，以及技术对就业的冲击等——中美拥有迫切的共同利益来协调立场、建立风险管控机制。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围绕 AI 安全标准、伦理规则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普惠等议题，中美合作对于塑造负责任的全局 AI 治理秩序至关重要。

总的而言，中美之间有望形成基于实力的长期竞合与战略稳定关系。虽然中美在 AI 领域的战略竞争并不会因此次特朗普访华发生根本性改变，但通过元首外交的引领与工商界的务实互动，双方正尝试为这场难以避免的竞争安装“安全护栏”与“合作通道”：竞争体现在对技术制高点、产业标准与全球影响力的争夺；合作则存在于危机沟通、风险防控以及惠及人类的共同议题之中。构建中美在 AI 领域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双方能否超越零和思维，在承认并尊重彼此发展路径

差异的基础上，将竞争控制在有序范围内，并将合作拓展至人类共同利益最集中的领域。这不仅是双边关系的稳定器，也将决定 AI 时代全球治理的走向。

特朗普访华的“减压阀”与中美关系的短暂窗口

李品保 IPP 副研究员

2026 年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输不起。眼下，白宫的成绩单极为严峻：国内通胀反弹，3 月 CPI 爬升至 3.3%，他的经济支持率已跌至 30% 的危险线。海外烽火不断，伊朗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交织，美国正深陷中东泥潭。

重压之下，这次 5 月中旬的北京之行，成了他最迫切的“减压阀”。他急需这场举世瞩目的元首会晤，来分散国内对手和媒体的注意力。看看随行团超高的含“金”量，商人总统的经贸企图不言而喻。这透露出一个核心信号：当下的华盛顿，对华有着极为现实的“刚需”。国内选民怨气大，他需要中国大举采购农产品和能源来平抑物价；高精尖产业面临瓶颈，他需要中国稳定关键矿产的供应链；中东乱局难以脱身，他更需要借助中方的特殊斡旋能力。正是这些硬利益的驱动，促使中美达成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

基于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短期判断：在 11 月中期选举尘埃落定前，为了稳住选票基本盘，特朗普政府大概率会倾向“稳”字当头。但对“交易型外交”的本质，我们必须保持冷静。

一旦选战过关，或者国内政治压力再度爆棚，特朗普完全可能为了新的政治风向迅速变脸。强硬的对华议题，随时会再次成为他转嫁国内矛盾的工具。因此，面对下一阶段的中美互动，我们既要抓紧眼前窗口，更要对未来潜在的“动态颠簸”做好准备。

中美关系新起点：经济互补与人文交流

朱雁翎 IPP 副研究员

中美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访华。这是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的一次重要会晤，也是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次重要会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使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元首外交也为中美之间经贸、人文的对话机制注入更多动力。

一是发挥中美经济的互补性，构建更平衡、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要达成中美之间未来一段时间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需要超越大国博弈或阵营对抗的思维，从全球共同利益的角度去思考中美贸易关系。

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是：怎样的双边贸易可以使中美两国都取得较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中美之间可以保持良性竞争关系。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两国有多样的渠道和方式，通过贸易关系的调整来改善自身发展状况。认识到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强调两国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二是促进中美人文交流，尤其是青年之间的互动。中美人文交流是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础，涵盖了教育与学术、文化与艺术、科技创新等领域。目前，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中美社会各界有望保持更积极的对话与互动。特别是青年互动，更能构建跨越代际的桥梁，增进两国互信。习近平主席次

迎更多美国青年来华参访、学习。特朗普总统也多次表示欢迎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这种双向交流将开阔年轻人的视野，更好塑造中美关系的未来。

从三个细节看中美关系的结构性转变

刘深 IPP 新媒体主管

2026 年 5 月 13 日至 15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完成了他第二任期内的首次对华国事访问。与 2017 年 11 月他的首次访华相比，本次访问在行程安排、议题设置和互动模式上的许多细节变化，体现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在发生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变。

一、行程：从务虚到务实

回顾 2017 年特朗普的首次访华，尽管许多行程安排时至今日仍被人津津乐道，如特朗普夫妇参观故宫博物院，在中方领导人高规格的陪同下喝茶、看京剧、体验文物修复并享用私人晚宴；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美企业家对话会并共同见证 2500 亿贸易大单的签署；在当年的欢迎晚宴上，中方甚至邀请了新老两届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陪同，营造出了一种极高的外交礼遇与“老友相会”的温情氛围。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行程安排更多呈现出一种“表演性”和“观赏性”，主要目的还是为双边关系进行铺垫和试探。

2026 年的访问明显更为精简和直接。同样是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特朗普一行在 5 月 13 日傍晚专机落地后，代表团直接前往四季酒店休息，没有安排任何礼仪性互动；14 日上午的正式双边会谈时间比原计划拉长了一倍，达到 2 小时 15 分钟；15 日的收尾阶段，同样没有安排任何游览行程，而是直接安排两国元首在中南海进行私密的工作茶叙、园林漫步和午餐会。此外，参与本次会晤的中方的核心团队也明显更为精炼，主要为中央政治局负责政治、外事外交和宏观经贸的高级官员。这种“小团队、长时间”的闭门互动，凸显了本次访问极其务实并专注于解决问题的核心特征。

二、接待：从“超规格”到平等对话

在接待规格与展示元素的变迁中，中方表现出了更加从容、对等的“平视”姿态。

首先，2017 年特朗普对中国的访问，只是其出访亚洲五国系列多边行程中的一站。而本次的特朗普访华行程，本身就是一次策划许久的专程对华出访，中国的分量明显更重，双方平等相见的姿态亦更为明显。

其次，本次行程中的展示的一些文化符号，也更为凸显中国自身作为大国的实力和形象，而不像上次访问那样“谦和”。例如，新华社在特朗普访华侧记一文中特别提及了一样元素——作为两国元首合影背景的、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中的巨幅画作《金山岭晨光》。在中国的外交语言中，这一画作作为两国元首合影的背景，本身就传递出了许多值得解读的信息。一方面，画作中的“晨光”传递出中方对中美关系结束长夜、稳步向好的希望；另一方面，画中的长城则展示出中国的实力、定力与不动如山的决心。这种“刚柔相济”的元素展示，明显比上次单纯的文化要素更具“硬度”。在当前全球饱受地缘冲突动荡的背景下，两国元首共同参观寓意“祈求风调雨顺”的天坛，也体现了中国作为地缘稳定力量的大国角色。

此外，在欢迎晚宴的出席人员安排上，中方官员序列的出席阵容更为精简，反倒是多位与美国到访企业具有深度产业链互嵌关系的中国民营企业被特别凸显，例如在俄亥俄州设厂的福耀玻璃，作为苹果和特斯拉核心供应商的蓝思科技，与高通和美光长期合作的联想等。除此之外，中方的小米、字节跳动等前沿科技、战略制造、人工智能企业的掌门人出席，也是在展示出一种对特斯拉、苹果等美国企业的“可替代性”。这种“官对官谈红线，企对企谈生态”的重组，一方面是在提醒美国经贸界中国经济元素的实力和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也是中美在部分高端产业可以实现某种“平起平坐”的客观展示。

三、议题：从“大单”到“制度重建”

在 2017 年的访华行程中，特朗普的最大成果是一份价值 2535 亿美元的贸易意向大单。尽管其中多为非约束性的传统能源、化工和航空器采购，具有明显的短期“交易性”，甚至可以说是“敲竹杠”的特征，但回国后仍被特朗普作为个人政绩拿来炫耀。

2026 年的会谈，虽仍有中方购买 200 架波音飞机和农产品贸易等短期交易达成，但真正引人注目的，则是一系列事关两国长远经贸关系发展的结构性机制安排。例如，在金融与投资领域，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用以监督和划定非敏感领域的双向投资。外界也普遍预期，中美正在人工智能领域商讨建立一个常设机制，以商讨形成最低限度的技术安全共识。这显示出，一方面中美经贸正式告别了单纯的“买卖关系”，特朗普政府也已经放弃了通过短期交易和“大单”的方式来平衡中美贸易；另一方面，这也显示中美经贸关系已经进入了“受管控的相互依存”阶段。制度型护栏的建立，是为了在中美高科技领域局部脱钩的同时，确保剩余的商业大盘不至于全面崩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如今双方都不希望中美关系继续恶化。

对比 2017 年与 2026 年特朗普两次访华行程的变迁，我们不难发现，中美关系已经度过了早期带有戏剧性和试探性的阶段，开始在对等平视的格局下，通过建立结构性和制度化的防火墙，来共同管控仍旧充满不确定性的中美关系大局。

中美战略稳定共识仍待机制化落地

陈佳慧 IPP 助理研究员

2026 年中美元首北京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双方就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形成重要共识。这一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双边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中方提出这一框架，释放出超越零和博弈、探索竞争中稳定共处的战略意图。美方对此作出积极回应，表明双方至少在一个基本判断上形成共识：中美竞争将长期存在，任何一方都难以单方面取得决定性优势。在此基础上，双方需要在台湾、经贸、科技等关键议题上为竞争设置边界，确保分歧可控，防止竞争失控。

这一新定位至关重要。传统战略稳定多以核威慑制衡为托底机制，而当下 AI 技术赋能军事、中美博弈持续升级，现有机制已无法有效管控风险、维系长期和平。2024 年 APEC 会议期间，中美双方领导人确认应由人类控制核武器使用的决定，并强调应本着慎重负责的态度在军事领域发展 AI 技术。这是中美在 AI 治理领域少有的共识性议题，但还远不是制度性安排。

从目前公布的初步成果看，经贸领域出现一定积极进展，包括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就关税、市场准入等核心议题保持沟通协调。科技领域的突破则仍有待观察。会前，美国财长贝森特释放中美两国将就 AI 安全措施启动对话的信号。目前双方围绕 AI 议题尚未宣布新的制度安排，高端芯片出口管制等关键问题也未见明显松动。

未来观察重点在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能否从外交表述转化为具体的执行机制。考虑到年内中美仍有多场双边及多边高层互动窗口：美方已邀请中方领导人秋季访美，叠加后续深圳 APEC 峰会、迈阿密 G20 峰会等重要场合，相关合作成果不会一次性敲定，更细化、更大规模的合作事项或将在后续会晤中逐步兑现。

本文 2026 年 5 月 17 日首发于“IPP 评论”

【霍尔木兹危机与特朗普的美国新战略】

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认识美国”？

田雷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访青年学者

导语：近年来，随着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阶层固化和右翼民粹兴起，曾经关于美国的许多经典叙事，已经难以解释当下这个更加复杂、矛盾和分裂的美国。作为长期研究美国宪法与宪制变迁的法律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关注美国政治秩序背后的历史结构；而作为译者和出版者，他又熟悉美国思想著作和纪实文学，长期关注这些文本背后所折射的社会变迁、阶层分化、政治极化与文化冲突，以及其在中文世界的传播。

2026年5月，IPP明远讲坛特别邀请田雷围绕“关于当代美国的多元观察”展开分享。在此次演讲中，田雷从中国知识界理解美国的变化出发，回顾了从“近距离看美国”到“重新认识美国”的问题意识转变，并结合近年来关于美国社会危机的大量著作，分析其中自传体、返乡体、游记体和编年体等不同叙事方式。在他看来，这些作品反复呈现的美国普通人的失落与困惑，也折射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的深层变化。他深刻指出，理解今天的美国，不能只停留在现实事件和社会情绪层面，更需要把美国本身和我们观察美国的方式同时历史化。

以下内容根据田雷教授的演讲内容整理完成，内容有删减。

一、为什么今天要“重新认识美国”

作为一名学者，我写过一些关于美国法律的文章，也出版过专著；作为译者，我做过不少翻译，包括法学专业方面的翻译；作为一名出版人，前几年我也和一些出版社合作做过几套译丛。

在我看来，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界曾大量引进西方经典和前沿著作，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会在同一时期受到同等重视——有些曾长期处于边缘的著作，会在特定历史节点突然变得重要；而有些曾居于中心位置的思想资源，则可能随着时代问题的变化逐渐退到边缘。

美国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他在 1970 年去世后，按照相关版权规则，他的作品在 2020 年，也就是去世 50 周年之后进入公版。随后，他的一本书在中国出现了密集译介——《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这本书。

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则是可以对照的例子。这部作品出版于 1971 年，长期被视为理解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必读书。然而，2021 年是《正义论》出版 50 周年，我曾做过一个检索，发现中文学术界和思想界并没有围绕这一节点展开太多讨论。

这一现象也侧面说明，中国思想界在理解美国的问题上，确实发生了某种知识重心的转移：一些人物、论著和思想资源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另一些曾经居于中心的资源，则正在逐渐淡出。

进而由这一变化引出的是一个时代抛给我们的问题——“美国究竟怎么了？”

近几年，无论是学术著作、思想评论，还是纪实文学、社会观察，似乎都在反复追问这一问题。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 *People, Power, and Profits: Progressive Capitalism for an Age of Discontent* 被译成中文时，书名被译为《美国真相》。这个标题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它暗示我们过去对美国的理解可能并不充分，甚至可能存在某种认知偏差，因此今天需要重新揭示所谓“真相”。

前两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的王希教授和《美国研究》编辑部主任赵梅也合编了一本书，书名也很有启发性，叫《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这本书出版前，王希教授曾邀请我写一段推荐语。我当时大体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重新认识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二、“近距离看美国”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曾经一度认为自己已经相当了解美国。以法学研究为例，当年我们对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熟悉程度，甚至常常比西方媒体反应还快。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又要说“重新认识”“重新理解”？为什么这会成为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面对的一项新任务？

关键就在“重新”二字。它提示我们，问题并不只是美国发生了变化，也在于我们理解美国的方式、材料和坐标系本身，也正在发生变化。

有些文艺作品在反映美国这一问题上，事实上有时是领先于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看《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和 30 年后再看能够看到的情节、能够意识到的重点，可能是不一样的。当年，中国观众看《北京人在纽约》，可能更多看到的是“天堂”的一面。相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美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确实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领先。但实际上，这部剧反映的美国仍然是很立体的。

2024 年前后，我有机会把自己关于美国的一些研究和写作结集出版。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著，而是一本文集，我给它取名为《美国折叠：置身事外的反思与批判》。“美国折叠”想表达的意思是：美国非常复杂。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大国”；美国同样也是一个大国，美国的历史其实也并不短——尤其从宪法学的角度来说，因为美国首先是一个宪法共同体。

后来，我把它称为“双重历史化”。

第一重历史化，是把美国本身加以历史化。我们研究美国、观察美国、理解美国，就要知道美国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现象”——它一直随着历史变化而发生各种变动。比如我自己做研究时，主要研究美国早期宪法史，我把它界定为从建国到重建，大体上以林肯作为时间下限。

第二重历史化，也是我今天可能要重点谈的，就是要把我们作为观察者自身也历史化。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是立足于 2026 年，或者立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去看美国，而不是毫无反思、毫无批判地照单全收改革开放以后那一代人对美国的研究方式和观察角度。

对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林达（美国籍华人作家夫妇丁鸿富、李晓琳共用的笔名，编者注）的一些论述在那个时期影响非常大。他们以普通人的身份在美国“近距离观察美国”。读者印象最深的可能有三部——第一本是《历史深处的忧虑》，第二本是《总统是靠不住的》，第三本是《我也有一个梦想》。后来还有第四本《如彗星划过夜空》。这个系列就叫“近距离看美国”。

林达当年的风行一时，构成了我们曾经认识美国的一个重要范本，当然有其原因——从它的叙事特点或者从图书传播的角度说，它的卖点就在于“近距离看”。回信式文体能够让作者的观察、感受和思考更加自然地流露出来。如果叙事文体本身足够贴合，很多观察、很多个人感受、很多思想，就会更自然地呈现出来。

2002 年到 2005 年这几年，正是我刚开始做美国宪法研究的时候，有一位作者对我影响也很大，叫做薛涌。2004 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是在任总统小布什，民主党挑战者是约翰·克里（John Forbes Kerry）。薛涌当年在《书城》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两个美国的决战》。那篇文章对我影响很大，因为它让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还可以用这样一种视角来观察美国。薛涌的写作与当时国内研究者的写法不太一样，关键就在于某种“原汁原味”：作者生活在美国，基于直接的生活体验，形成了非常尖锐的观察角度。

另外一位影响很大的是刘瑜。刘瑜的文章当时在《南方周末》连载，后来结集出版为《民主的细节》。这本书 2009 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副标题是“美国当代政治观察随笔”。

我觉得，“细节”这两个字用得非常妙。所谓细节，就是只有“近距离”才能看见的东西；不是隔岸观火。从林达、薛涌到刘瑜，他们的美国研究，或者说美国叙事，都在强调这样一种视角。

前面这几位，都可以说是专栏作家。再从我自己的法学学科来说，我们最早接触的，包括法学经典《西方宪政体系》；另外一本大概也是同期出版的，是此前提到的王希教授写的《原则与妥协》。王希老师是埃里克·方纳（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德威特·克林顿荣休教授）的学生。这本书大概在 2005 年前后有了第二版，2014 年出了第三版；但即使第三版，到现在也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原则与妥协》讨论的是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内容从 17 世纪北美殖民地的起源一

直延展到 20 世纪末。还有一本影响也比较大，一度读者也特别多，就是任东来老师和几位学生合写的《美国宪政历程》。

如果说，前面这些构成了上一个时代的美国写作、美国研究或者美国叙述，那么今天回头看，我作为一位出版人，也有一些新的感受。

三、“美利坚伤心故事会”

我们前些年在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雅理译丛”时，出了很多以美国为主题的新书。至少有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如果大家看到“雅理译丛”出了一本美国主题的书，可能意味着我们要读大概十本关于美国的书。

如果你去看今天美国社会科学界对当代美国的研究，包括美国的纪实文学作品，会发现它们大体上可以被概括为“美利坚伤心故事会”——它们几乎都在讲美国社会危机的各种故事。

比如《钢的城》这本书，讲的是美国“锈带”的历史；《无地可依》也是这样。后面我们还有一些类似作品，比如美国很著名的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的《被偷走的尊严》。

我一直在梳理一个问题，当美国人在讲他们自己的“伤心故事”时，他们到底是怎么讲的？

接下来，我会把一些作品拿出来讨论。有些作品大家可能很熟悉，有中译本，甚至读者相当多。我把这些“伤心故事”的叙事文体，大体归纳为四种类型。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四种类型并不是基于某个非常严格、一以贯之的标准区分出来的。

第一种叙事文体，我称之为“自传体”。

这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就是 J.D.万斯写的《乡下人的悲歌》。今天大家对万斯都已经很熟悉了。《乡下人的悲歌》一开头就说，它是一本回忆录。大家知道，万斯后来非常成功，不仅实现了经济上的跃升，也实现了政治地位上的跃迁。

《乡下人的悲歌》其实写得很丰富。万斯写到自己的家乡，叫米德尔敦。这个“米德尔敦”是音译，英文原文是“Middletown”，意思就是“中间的镇”。也就是说，这个地方非常普通。

另一本书，英文原名叫 Educated，中文译名是《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的作者塔拉·韦斯特弗（Tara Westover）比万斯还要年轻。万斯是 1984 年出生的，韦斯特弗是 1986 年出生的。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也是一种自传体叙事。它常被理解为一部女性成长文学作品。

韦斯特弗出生在一个摩门教家庭。她的父亲认为孩子不能去公立学校，因为公立学校会对孩子造成某种“毒害”，所以她从小在家接受教育。她与父母之间的冲突，贯穿了整本书。后来，她通过反叛和自我学习进入大学，又继续深造，最后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雅理译丛“美国三书”中的第三本《无地可依》，从文体上看，也可以说是一种自传体叙事。这本书的作者克里斯蒂娜·沃利（Christine Walley），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人类学教授。整本书讲的，是她自己家族在芝加哥工业区三代人的经历。

《无地可依》中提到，当工厂倒闭的浪潮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时，一个很大的转变正在发生，许多钢铁工人后来投票支持新任总统罗纳德·里根。作者觉得，这是理解 20 世纪美国政治变动和政治冲突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在新政自由主义下形成的政治联盟，会在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

发生向保守派的转向？作者并没有完全沉溺在个人成长的碎片化细节里，而是把个人经历和阶级、家庭、工业衰落、环境污染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第二种文体，我把它概括为“返乡体”。

自传体和返乡体在某种意义上都有一个叙事主体，都是以“我”的视角展开。但返乡体可能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类似鲁迅小说《故乡》中的叙事：若干年之后重新回到故乡，重新观察故乡的变化。

我这里举一本书，英文原名是 Tightrope，书名直译就是《走钢丝》。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对夫妻。妻子伍洁芳有华裔背景，二人都曾是《纽约时报》记者。

所谓“返乡体”，是说这本书的第一作者，也就是夫妻中的丈夫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回到了自己小时候成长的社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个视角非常震撼：作者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追踪那些曾经和自己一起坐校车上学的同学，追踪其中许多已经去世或深陷困境的人，追踪他们后来的人生历程。

如果说“自传体”往往是年轻人的写作，那么“返乡体”则是在两个时间之间展开对话。自传体更像是青年成长的叙事，而返乡体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中年叙事。作者克里斯托夫出生于 1959 年，Tightrope 出版于 2020 年，当时他大约 60 岁。

另外还有一种，我把它称为特殊的“返乡体”。比如《被偷走的尊严》，以及作者此前一本书《故土的陌生人》。我说它是“特殊的返乡体”，是因为作者并不是回到自己出生、成长的故土，而是回到她长期以来固定关注的“田野点”。对于作者阿莉·霍克希尔德来说，“田野点”就是她观察美国右翼政治、阶级情绪和社会衰败的重要现场。

第三种文体，我把它概括为“游记体”。

我之所以想到“游记体”这个说法，基本上也是和雅理译丛的一本书有关。“美国三书”里有一本叫《寻路》。为什么取这样一个书名？因为两位作者中，一位是民主党人，另一位是共和党人，两个人的政治立场并不相同。于是他们在读书期间做了一个设定：共同开车自驾横穿美国，观察美国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政治文化。

书里讲到，他们一路走走停停。作者认为，如果想避开政治话题，就应该在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场景中认识他们。他们强调的是：通过这样一种亲身观察，他们理解到了美国社会的复杂性，也尝试站在对方的政治立场上看待问题。

第四种文体，我把它称为“编年体”。

编年体一个很典型的文本，就是前几年已经有中译本的《下沉年代》。它的章节结构，基本上是从美国过去几十年中选择若干年份。每一个年份，往往从一个政治人物，有时也从一个普通小人物的视角切入，借由那一年中的某个人物或某个故事，进入特定历史时期的美国。这个叙事视角非常好。

当然，《下沉年代》讨论的是美国的“下沉”。书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大意是：没有人能说清楚“解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像任何重大变化一样，解体是在无数时刻、以无数方式开始的。

如果说《下沉年代》对中国读者，尤其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父辈来说，有一个可以参照的作品，我觉得那就是《光荣与梦想》。如果《下沉年代》讲的是美国的“下沉年代”，那么《光荣与梦想》讲的则可以说是美国的“上升年代”。

《光荣与梦想》是威廉·曼彻斯特关于美国 1932 年至 1972 年的叙事史，1974 年在美国出版，1978 年即被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书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成为一代读者理解美国的重要文本。

这就是我说的第四种文体，我把它称为“编年体”。编年体和游记体可以对应起来理解：一个是在时间上的走走停停，一个是在空间上的走走停停。

当然，前面归纳的四种文体，在我看来更多是一种理想类型。绝大多数作品并不会严格对应其中某一种，而往往是混杂的。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十年前我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修改《我们的孩子》这本书的译稿。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同时包含了前面说的四种叙事元素或叙事文体。作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是美国政治学家，但他这本书也有关于自身成长年代的美国叙述，因此具有自传体成分。同时，它也有返乡体成分。

贯穿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叙事结构，是帕特南作为一位 20 世纪 40 年代出生、在二战后美国“黄金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回到自己的故乡，去观察今天仍生活在故乡的年轻人所遭遇的不同历史处境。

其中有一段话，其实体现的就是返乡体的叙事。帕特南大意是说，我们这些 1959 届的美国高中生，生活中好像有一架自动扶梯，带着我们往上走；但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以及今天，当我们的子女、孙子女想要踏上这架自动扶梯时，扶梯却戛然而止了。

为了写这本书，帕特南还回到故乡，访谈当年的高中同学。其中有一位高中同学是黑人女性，她后来也在事业上取得了一定成功。她对帕特南说了一句话，让帕特南很感慨，我读到时也很感慨。她说：“你的过去不是我的过去；你的现在也不是我的现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便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小镇、同一个年代，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人所经历的美国也并不相同。

四、“伤心故事”背后的共同意象

介绍完了四种叙事文体。我还想再谈另一个问题。读这些作品时，你会感觉到，这些所谓的“美利坚伤心故事”中，有一些叙事意象在不断反复出现。

其实，我做出版也能感觉到，中国当代年轻人很喜欢读一些人类学作品或者社会纪实类作品。我们“雅理译丛”也在尝试发掘这方面的本土原创作品。但总的来说，今天的年轻读者确实比较喜欢读这类纪实文学。

第一种意象：故事。

无论是由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业学术著作，还是由商业出版社出版的普通作者的个人成长叙事，几乎都在强调一点：我是在讲故事。比如《乡下人的悲歌》就说，这不是学术研究；作者当然也知道学术研究如何展开，但在他看来，讲述真实的故事更重要。刚才提到的《无地可依》，作者是一

位人类学家。她说，她讲的当然不是作者本人的故事，而是她父亲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不是一个简单的趣闻轶事，而是一种分析世界的方式。

《寻路》其实也是这样。书里有一些很动人的细节。比如，有一次旅途中，两位作者遇到了一位美国黑人女性。她大概在监狱里度过了大半辈子。当两位作者和她交流时，这位已经到了中老年的黑人女性说：“我想让立法者体会到你们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你们讲述这些故事。”也就是说，故事带给人的震撼，是任何抽象数据都无法做到的。

《钢的城》这本书其实不那么好读。有的学术书很好读，但这本书确实不太好读，它其实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我觉得其中有一个表述很准确：作者讲故事，是要把日常生活的“毛孔”展示出来。

再比如《故土的陌生人》和《被偷走的尊严》，反复讲的就是一个“深层故事”。所谓“深层故事”，不是事实判断，也不是政策论证，而是一种人们用来理解自身处境、解释现实不公和情感秩序的内在叙事。霍克希尔德在《故土的陌生人》中提出“deep story”这一概念，用来解释她在路易斯安那田野调查中所接触到的茶党支持者如何理解美国社会与自身位置。

第二种意象：变化。

这种变化往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变化，而是巨变，是短时间内发生的剧烈变化，是强烈的社会撕裂。

比如，《我们的孩子》的作者罗伯特·帕特南还写过一本更为人所熟知的经典作品，叫做《独自打保龄》，它讲的也是美国社会的变化：美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原子化、个体化。

所以，这第二种叙事元素就是“变”。而且这个“变”，往往讲的是消失、瓦解、烟消云散和失去。如果大家读这类作品，会反复看到这样的表达。

《乡下人的悲歌》里说，能走的人都走了，剩下的就是穷人。《无地可依》也在追问：为什么我们一直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开始消失？为什么变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寻路》里也有这样的表达。比如他们到达底特律时，讲到一切仿佛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故土的陌生人》也是这样讲的：柑橘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型购物中心。

所以，第二个叙事元素就是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与时俱进”，也不是“明天会更好”，而是以消逝、瓦解、烟消云散、土崩瓦解的形式出现。

第三种意象，我把它称为“逃离与归来的碰撞”。

就像刚才说的“返乡体”：总有一些人离开故乡，后来又以某种方式返回；而“离开”和“回来”之间，正好构成了美国社会变化的张力。

《乡下人的悲歌》说得很清楚：万斯经常穿梭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是他后来走出去之后所见到的世界，比如耶鲁法学院、精英律所，以及今天他作为成功政治人物所进入的世界；另一个世界则是生他养他的那个世界。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作者在书的最后也说，其实有两个“我”。很多时候，她的父母会认为她的变化是一种背叛；但她认为，这个变化是从自己接受教育那一刻开始的。到最后，她写到，她迎来了新的生活，却也失去了巴克峰——也就是她的老家。

《无地可依》也是如此——作者年轻时其实申请到了哈佛大学，也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但她最终没有去。因为对她来说，去哈佛就意味着对生她养她的那个衰落工业社区的某种背叛。很有趣的是，在这几本书里，教育似乎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守门人。《无地可依》中有一个表述很漂亮。作者说，我们的身份就像一床由许多碎布拼成的被子——patchwork quilt。作者说，自己既是钢铁工人的女儿，也是中产阶级学者。

《故土的陌生人》里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同情之墙”。怎么理解？我觉得这里的变化很明显。霍克希尔德提出“同情之墙”，正是为了说明研究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情感隔阂：如果不越过这堵墙，就很难真正理解他们的深层故事。

第四种叙事意象，我把它称为“被动语态”。

这种被动语态在一些书的标题中经常出现。比如马修·德斯蒙德的《扫地出门》，英文原名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其中 Evicted 的字面意思就是“被驱逐”。《寒门子弟上大学》的作者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近年又出了一本书，叫 Class Dismissed: When Colleges Ignore Inequality and Students Pay the Price。

如果仔细检索，还会发现更多类似的例子：Educated——“被教育”；Evicted——“被驱逐”；Troubled——常被译作“陷入麻烦”，表达一种被外部困境裹挟的状态；还有《被偷走的尊严》，这些标题都带有某种被动语态的意味。它们强调的是：普通人并不是主动选择进入这些困境，而是被制度性力量、结构性变迁和社会条件推入了这样的境况之中。

这背后的意思是：这些人并不是主动选择进入困境，而是被某种结构性力量撞了进去。

《无地可依》也表达了类似意思：去工业化过程并非不可避免，它包含许多人为因素。但这些人作为因素，并不是那些“无地可依”的小人物能够决定的。作者之所以憎恶里根，是因为在她看来，是那些大人物替这些普通人作出了选择，并让他们失去了一切。

《寻路》里也有一个很有趣的访谈。书中讲到美国卡车司机。民主党人往往希望加强对长途运输和卡车司机的监管。但有一位卡车司机对作者说，制定这些法律的人根本没有开过卡车。他们制定的政策，只会让我们撒谎。这就是所谓“被动语态”背后的含义：普通人并不是简单地“选择”了自己的命运，而是被制度、政策、产业变迁、教育分层和社会结构推到了某个位置上。

《我们的孩子》中有一段话，帕特南认为，他那一代人曾经拥有一部“自动扶梯”，它带着他们向上流动。这有点像我们今天中国也在讨论的代际问题。在相关美国社会研究作品中，也有类似“自动扶梯”的比喻。它的意思是，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一部分人的自动扶梯仍然存在，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对于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说，生活事实上停滞在原地，被卡住了。这仍然是一种“被动语态”。

第五个意象，我概括为一种困惑、愤怒，甚至羞辱感。

这些情绪，既是叙事主体想要传达的，也是他们所访谈对象身上反复出现的。《故土的陌生人》和《被偷走的尊严》这两本书，副标题里就有一些明显的情绪词。前者讨论的是愤怒背后的“深层故事”，后者讨论的是尊严、羞耻与被剥夺感。

这种“不理解”，在《乡下人的悲歌》中也很明显。万斯写到，自己出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出生几个月后，他的外祖父把自己有史以来投出的第一张选票投给了里根。万斯追问：他们为什么会投给里根？其中有一句表述很有意思，大意是：“我不是很喜欢里根，但我恨死了民主党的蒙代尔。”

《钢的城》中也有类似访谈。有人说：“我每小时只赚 13.3 美元，这真的是我的全部价值吗？”这句话背后就是一种价值感被压低之后的羞辱。

《故土的陌生人》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插队”的叙事。作者霍克希尔德试图解释，为什么美国白人下层群体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愤怒。她的意思是：美国社会资源的分配，就像大家在排队领取某种机会和福利；但这些白人下层群体会觉得，自己的队伍前面不断有人插队，少数族裔、女性、移民、公共部门雇员，甚至在某些叙事中，连动物保护都被放在他们前面。到最后，他们发现，自己必须为自身存在的正当性辩护。

五、补上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美国这一课

最后，在我看来，如果今天要重新理解当代美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理解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美国社会发生的大转变。

之所以我们从曾经自认为非常理解美国，变成今天需要“重新认识美国”、需要发现“美国真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过去理解的美国——林达他们“近距离观察”的美国，以及各个学科中美国研究所呈现出来的美国——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以来的美国，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70 年代初的美国，是那个不断讲述“光荣与梦想”的美国。

但是，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美国社会发生了各种深刻变化。由于学术研究本身也有延迟和时差，这些变化并没有及时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也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特别强调所谓“当代美国”。

这里我自己有一个观点：我们要关心更大的秩序变迁。刚才我说“美利坚伤心故事会”，某种意义上我已经有些看厌了，因为它们太稀碎了。它们讲的是破碎生活，讲法上也常常沉溺于个体情绪。有时我们只看到破碎生活的碎片，却看不到背后更大的社会变革路径。所以，当我谈“秩序作为方法”时，是希望大家拥有一个更大的视野。秩序意味着起承转合，意味着一个结构从形成、运转、危机到转型的过程。

比如，我很推荐大家读斯蒂芬·斯科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的《总统创造的政治》。这是一本纯学术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它实际上按照两个维度，把美国总统区分为四种类型。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划分。

在我看来，这种划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美国政治中很多很有趣的现象。比如，我有时会提出一个问题：美国历史上凡是公认为最伟大的总统，往往都有干预司法独立的历史记录？用斯科罗内克的理论就能解释其中一部分。他认为，美国至少有一类总统属于“变革型总统”。这类总统出现时，原有的政治秩序已经进入摇摇欲坠、极其脆弱的时期；而新上台的总统，又是这个旧政治秩序的造反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罗斯福。

我之所以谈“秩序作为方法”，还和当年做美国宪法研究时的学术资源有关。我们当年做美国宪法研究，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的《我们人民》系列对我们影响很大。

我们仍然需要大的路径，需要理解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这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在我看来，那些社会科学研究作品有时仍然比单纯的纪实作品更有启发。

这边还有两部与宪法相关的书籍，我觉得也很有趣。

其中一本，是我 2008 年至 2010 年在美国法学院读书时出版的，叫 The Constitution in 2020。这本书有点像一个自由派宪法变革纲领。当时，在很多美国自由派宪法学者看来，奥巴马当选似乎是美国民主的一次里程碑式事件，也像是美国种族问题得到某种救赎的标志。于是，大家开始畅想 2020 年的宪法图景。但后来没有想到的是，2020 年会变成一种“一地鸡毛”的局面。

如果熟悉美国法，就会知道这本文集的作者阵容非常强，几乎都是过去二三十年美国自由派宪法学界的大咖。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本身就带有一种讽刺意味。我们当年都读过这本书，但后来再说起来，好像自己也都把它忘掉了。所以，我一直觉得，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美国社会的变化是我们今天研究美国时应该补上的一课。

研究美国史的人，基本上也存在一个“时差”问题。比如，做美国早期史的很多，做进步主义时代的也很多，做罗斯福新政时期的也很多；但真正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美国社会变化的，我觉得并不多。当然，美国学界已经有一些研究。

比如这本 Reaganland: America's Right Turn 1976 – 1980，讲的就是“里根时代”或者说美国如何向右转。

Fault Line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74 则讲的是 1974 年以来美国历史中的“断层线”。两位作者凯文·克鲁斯和朱利安·泽利泽认为，当代美国的分裂，尤其是收入不平等、种族分裂、性别和文化规范变化、媒体碎片化等问题，都可以追溯到 1970 年代以来的深层变化。

还有一本 Stayin' Alive: The 1970s and the Last Days of the Working Class，讲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与美国工人阶级的最后时光。这本书的书名很有趣，来自一首流行歌曲。

我所谓的“当代美国”，其实就是希望把这样一个研究领域更加直观地展示出来。

※文章根据田雷教授在 IPP 明远讲坛的讲座发言整理，内文有删减。本文 2026 年 6 月 26 日首发于“IPP 评论”

【新时代的中国海洋战略】

从我国海洋立法和维权实践视角看海洋强国战略的历史演进路径

吴士存

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祝贺 IPP 成立以来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今天我想从三个部分来讲：一是我国海洋立法实践的演进；二是新中国海洋维权实践的演进历史；三是结合这次会议主题——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在海洋领域也有一些建议和大家分享。

一、我国海洋立法实践的历史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海洋立法实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期，主要特点是从无到有、填补空白。

一是 1951 年 8 月 15 日，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任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发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这个《声明》从今天来看至关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威岛（实际上应该是南沙群岛，但他当时用的是 Spratly，翻成了中文南威岛）和西沙群岛之不可侵犯的主权，不论美英对日和约有无规定及如何规定，均不受任何影响。”

二是 1958 年，这里有一个背景：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公布了四部公约——《领海及毗连区公约》《公海公约》《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和《大陆架公约》。《公海公约》出来以后，紧接着新中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公海公约》那时候领海宽度还没统一，有的是 3 海里，有的是 12 海里，一直到 1982 年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海洋法公约》里才明确统一为 12 海里。所以我们在 1958 年就公布了领海声明，其核心条款：（一）确定 12 海里的领海制度；（二）领海基线；（三）入境规则明确外国军舰军机未经中国批准不得进入我国领海和上空；（四）领土适用原则，即 12 海里领海一致性基线适用于我国台湾、澎湖列岛、钓鱼岛以及南海四大群岛。所以 1958 年的领海声明也至关重要。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至本世纪初，这一段时间的立法主要是问题导向。

第一部法是全国人大在 1982 年审议通过的《海洋环境保护法》，这是我国首部规制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随后，全国人大又审议通过了《海上交通安全法》《渔业法》《海商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构成了新型涉海规则法律体系的重要法律基础。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通过，1994 年生效，我国在 1996 年被批准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同时我们在 1996 年又公布了第

一批领海基线，沿海也没有划全，还有西沙群岛，北部湾在 2004 年才把海南岛的西侧划完。国务院又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所以这个阶段主要是呈现出一个追赶式的立法格局。

第三阶段由本世纪初到现在，以修订完善为主要特征。因应新形势变化，修订已经制定的涉海规范性文件，出台新的规则，主动对接国际前沿涉海议题，为我国海洋事业提供法治保证。

2015 年以来，经初步统计，全国人大对涉海法律作出了 12 次修订或修正，国务院对涉海规则规定作出了 23 次修订。这一阶段，立法实践为我国海上维权提供了规则依据。尤其重要的是 2021 年我们出台了《海警法》，这应该是规范我国海警在海上执法的首部法律。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首部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囊括涉海规范的法律，是我国第二部法典（第一部是《民法典》）。这部法典把我国涉及海洋的四部单一型法规整合在一起，从 8 月 15 日开始实施。一旦生效以后，原有的这四部法律全部终止，它的意义就在于解决了海洋环境法律碎片化的问题。

二、新中国海洋维权实践的演进

我国海洋维权实践也有几个特点或类型。

第一个类型，坚定地回应外部侵权行为，有效维护南海诸岛主权。其中有几次我们称之为战争也好、反对外国侵权的武力行动也好。

1974 年 1 月 19 日，我们和当时的南越打了一仗，收复了西沙群岛（也即永乐群岛），从 1974 年 1 月 19 日开始，我们完成了对整个西沙群岛的控制，所以西沙群岛现在完全在我们手里，这就是西沙海战。

1988 年 3 月 14 日，我们和现在的越南打了一仗——“3·14”海战。当时越南人死了 60 多人，越南最近公开报道的有 64 个人，我们只有 1 个，是当时的舰艇舰长，现在应该退休了，原来南部战区海军政委杨志亮中将受了一点伤。但是我们第一次在南沙有了存在，当时我们一下子收复了 4 个岛屿。

1994 至 1995 年，我们又增加了一个礁盘，控制了美济礁，当时引发了美济礁事件，和菲律宾的关系一度降到了低点。岛礁建设以后，美济礁成为南沙我控岛礁陆域吹填之后最大的岛，有 5.6 平方公里，胡波教授也上去过。

第二个类型，抓住窗口期，巩固并向国际社会展示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水域的有效管辖。

尤其重要的是 2013 至 2015 年我们进行陆域吹填，这是一个窗口期。正好菲律宾提起南海仲裁，我们开始吹填。美国那时候也没有关注到我们，一直到 2015 年，基本上我们填得差不多了，美国人才开始。我当时也纳闷，我说我们干那么大的事，美国没有任何反应，不像是美国。等他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基本填得差不多了，所以这一点至关重要。

2016 年，我上了美济礁。美济礁事件出现以后，当时我是海南省外办新闻处处长，主管涉外事件。菲律宾报复，抓扣了海南 4 条渔船、62 个渔民，我亲自去处理，也上了巴拉望公主港市。20 年之后再上，我们把美济礁填起来，那种震撼的感觉，没有国家的强大，没有今天的意志，这种事情是干不了的。

二是 2014 年 5 月至 7 月，我们在西沙中建南进行油气勘探。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到现在还主要是在珠江口盆地和海南岛近岸，2014 年 5 至 7 月，西沙中建南也称为“981 钻井平台事件”，又把我们的油气开发向远海推进。

我这里有一个 3 分钟的视频，可以放给大家看看，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维权、我们在南海要做一点事，面临来自周边国家或者域外势力的抵抗，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视频）

对手是越南，可以看得出来这还是在西沙、在我们完全的控制之下，而且油气构造在我们的毗连区里，在西沙群岛毗连区中建岛至南 17 海里的地方。大家可以想象出来，而且我们的邻国同样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我们在海上做一点维权的事尤其是勘探的事还面临这么大的阻力，大家可想而知。这就是我们利用窗口期维权。

2024 年 11 月 8 日，菲律宾公布了两部“恶法”：《海洋区域法》和《群岛海道法》，我们借机在 11 月 10 日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去年我们又同时公布了黄岩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这就是抓住窗口期来进行维权。

第三个类型，以南海诸岛真正和唯一主人的大国担当，在南海地区秩序构建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一是北部湾划界谈判。去年我们和胡波教授一起到越南去，因为我从 90 年代初就参与了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这是双边通过友好谈判的方式解决海洋争端。实际上北部湾划界谈判总共只涉及 12 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划分，但是实际上 70 年代开始就谈了，后来因为中越关系恶化，从 1991 年开始中越关系正常化之后又开始谈，前后花了 26 年，一直到 2000 年才签署了《北部湾划界协定》。所以去年是划界协定签署 25 年，我们到河内举行了纪念活动。

二是规则建设。从 1996 至 2002 年，我们制定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三是 2013 年又开始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因为菲律宾提起南海仲裁案，2016 年 7 月 12 日仲裁裁决出来以后，由于裁决有效，国际社会一部分国家要求中国执行裁决，我们也面临很大压力，所以我们就聚焦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目前已经完成了三读，菲律宾承诺要今年完成。2023 年“中国—东盟外长会”也承诺三年之内完成，在我看来是比较悲观的，基本上今年要完成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中国一直致力于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规则建设。

第四个类型，围绕仲裁案进行系统批驳。

仲裁裁决到今年 7 月 12 日整整十年了。我们把它视为一张废纸，实行了“三不”（或“四不”）政策：不接受、不参与、不执行、不承认。但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个统计数据是：关于仲裁裁决，国际舆论的反应没有发生向我们这边的倾斜。到目前为止，大概有 30 多个国家支持仲裁裁决，还有 17 个认为对中国有约束力，只有 7 个国家反对仲裁裁决，而且有些是 10 年前支持我们的，现在立场要么中立，要么倒到菲律宾那里去了，可见我们在应对仲裁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到今年 10 年，我们也有一系列行动，包括在海南、香港，我们还有第三方新的批驳报告出来。这件事不是一锤子定音的事，批驳裁决永远在路上。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裁决是政治闹剧、裁决不等于国际法、裁决仲裁庭的组成和管辖权有瑕疵”成为一个国际共识。

三、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海洋强国理论

关于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我记得永年教授在新加坡时已经提出了这个构想。我觉得恐怕我们有几个方面要做的事。

一是在立法层面要下功夫。对我国新兴的海洋法制度，有的已经出台的法律要修订、要补充，并且要研究制定出台中国的海洋基本法，我们到现在没有一个海洋基本法。日本 2007 年就已经出台了，而且我还记得当时国家海洋局召集我及一些所谓的专家去座谈怎么制定我们的海洋基本法，那是 2007 年，到现在将近 20 年了还没出来。傅莹同志在担任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时说“老吴，我们一起努力，争取在十二届人大期间能够把这部法弄出来”，到现在还没有出台。越南 2012 年已经出台，菲律宾 2024 年已经出台，而且日本 2007 年海洋基本法修订了三次。另外，它在这部法律框架中还有一个海洋基本计划，这个计划每五年一个版本。所以我觉得一是我们要有自己的海洋基本法，二要修订我们的法案。

我们的《领海毗连区法》1992 年到现在 30 多年了，没有修订过一次。1998 年我们出台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到现在也将近 30 年了，没有修订过。至少像《领海毗连区法》第六条就是外国军舰进入中国，必须经过审批。美国人也跟我们说“总有一天，你们中国的海上力量和美国一样强大时，你也希望别人经过审批”，即实施无害通过制度。其实我们也向有关部门建议过，《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十三条很笼统，“该法不影响中国享有历史性权利”，你的历史性权利在哪里？东海、南海、黄海？是什么历史性权利？是捕鱼权还是航行权还是资源开发权？非常笼统，我觉得要修订了。

二是在涉海话语体系建设和基础研究领域要做足功夫。尤其是现在的南海外大陆架申请，我们自己是否提交？如何提交以及有关行动的合法性的系统研究和评估。其实南海外大陆架之外全部提交了，越南和马来西亚 2009 年提交了南海南部的，后来越南又单独提交，马来西亚 2019 年单独提交，基本上它的最北部已经接近黄岩岛了。2024 年 6 月菲律宾提交，紧接着越南也提交了南海中部，2024 年 7 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提交，是否提交、如何提交，提交有利有弊，我们恐怕也要做相应的评估。

最后一点建议，就是要从历史、国际法、国际关系等多学科融合的视角构建有利于地区治理合作、淡化分歧的南海新叙事。南海新叙事是一篇大文章，要聚焦和平、合作、安全、共同家园。同时永年教授也提到，我觉得要构建新叙事，至少要处理好几对矛盾：维权和维稳、安全与合作、开发与保护、近期与远期、域外国家与域内国家——域外国家的侵权和域外国家的介入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要处理好这几对矛盾和关系，才能真正构建起我们主导的南海新叙事。

谢谢大家。

【新时代的中国海洋战略】

全球海洋治理新进展及其对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

张海文

全国政协委员、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原所长

我重点讲一下全球海洋治理的新进展，以及给我们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全球海洋治理新进展有很多方面，我这里只是挑几个角度，特别是法治的角度、规则的角度。总体来看，目前我们总体的形势或者时代背景：全球海洋治理进入一个规则密集落地周期。这几年的新规则超过了以往很多年，所以这是一个特点，也是一个时代背景要考虑的。再就是新趋势总体来说，特别是对经济产业、海洋产业发展来说，总体是降碳、减排，再就是气候治理与海洋治理越来越密切协同治理。这是一个新趋势，后面会讲到这些新趋势对我们的海洋经济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直接影响的。

再就是看其他国家，特别是传统的海洋大国，刚才前面的学者报告中也都提到了，他们在海洋政策、战略、规划方面这几年不断有新的战略规划、战略布局。

一、海洋经济格局与海洋强国战略推进

海洋经济在全球经济里的比重也是越来越大的。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25 年，全球海洋贸易总额 2.2 万亿美元，承载了 90%以上的国际贸易，提供了 1.5 亿个就业岗位，这是联合国秘书长的统计。

从我们国内来说，海洋强国战略持续推进。我另外有过一个简单的梳理和研究：我们国家五年规划开始写入海洋的，仔细去看，在“九五”规划里几乎没有提到海洋，整个“九五”规划全程去翻，找不到“海洋”两个字。“十五”规划里有一段话讲到海洋，“十一五”规划里有一节把海洋和气候放在一起讲，是作为资源去讲的，在“十一五”规划里，我们叫海洋专节。从“十二五”规划开始才有海洋专章，特别是“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基本上都是三节作为海洋专章，能看得到海洋强国建设在规划里逐步落实，每五年地在推进。今年去看“十五五”规划，对海洋的篇章除了海洋专章之外，在别的篇章里涉及海洋的越来越多，而且是在一个很高的层级去说海洋，有明显的变化。所以说能够预计到“十五五”规划对于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对于推进海洋经济发展会有一个很重大的战略布局。

同时，国内一直在强调海洋的新质生产力。因为发展海洋经济，我们要从规模往高质量同步去发展。所以怎么样能够让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培育里面的新质生产力。目前，据国家公报，全国海洋经济生产总值超过 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5%，占 GDP 总量的 7.9%，这些年海洋经济部分一直在提高，这是从总体看。

二、全球海洋治理的规则新突破

具体来看全球海洋治理的新进展，特别是聚焦到规则、法治的角度，有历史性的突破。

一是《BBNJ 协定》于 2026 年 1 月 17 日开始生效。这个名称很长、全文很长，全名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这个协定名称很长，所以一般我们都简称《BBNJ 协定》。它重要的影响是会重构全球海洋“公域”格局，它管的是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里的生物多样性的问题。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部分就是公海，水体部分叫公海，海床底土部分叫国际海底区域。这个协定生效的范围是在这个范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三个执行协定。

里面的核心制度有四个：一是深海渔船资源利益分配的问题，也是《BBNJ 协定》之所以推动要谈、签这个协定的主要原因。因为按照以往，水体部分叫公海自由，包括捕鱼自由、航行自由、科研自由、飞跃自由等等。公海自由用通俗易懂的话就是谁有本事，你去行使权利、享受利益，这是公海自由。海床底土部分，根据《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规定，公海底下那部分/海床底土部分是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属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所以叫做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对应着公海的公海自由原则。特别是公约第十一部分执行协定，也是公约的第二个执行协定，里面专门限定了一下，就是说这里面我们说的资源仅指矿产资源。

但是随着科学进步，深潜越来越发现深海，特别是水深 3000 米、4000 米、5000 米以下的地方发现有生物资源、遗传资源，越来越丰富，而且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生物技术把它转化成了商品，有经济收益。而因为很多发展中岛国是没有能力的，到不了深海底（去接触）这些资源的，他们就提出“不能够用公海自由原则，不能够谁有本事谁捞走”。

西方国家则说“这部分就是公海自由，（采用）排除法，因为国际海底区域这部分属于人类共同所有的这部分只是矿产资源，这部分显然不是矿产资源，因此它适用公海自由原则。”发展中国家又有一个理由，说“这些资源和海底的热液喷口是紧密相连的，这部分基因资源不是满海洋到处漂的，和渔业资源不一样——渔业资源随着海水到处漂，这部分虽然是生物资源，但它是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范围里与海底的热液喷口密切相关的，所以它应该属于海底资源，海底资源就应该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是用这么一个逻辑辩论的。

最后，联合国大会同意制定一个新规则。所以现在这个新规则、新协定里把公海自由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两个原则都放进来了。其中保留了针对这些资源的科研、获取仍然可以用公海自由的原则，鼓励去做科学研究。但是现在你要获取，它有一个信息登记所，你要告诉国际社会你在哪一个海区获取了什么样的样品，后面的收益是要拿来分配的，这部分就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得到落实。所以构建了一个新的（规定），填补了一个法律上的空白，对这个新资源的利益分配问题。

再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前面这些实际上属于开发利用的问题，后面怎么保护？用划区管理工具，特别是包括公海保护区。所以在《BBNJ 协定》生效后，明年会开第一次缔约国大会，会成立很多下面的专业机构，里面会制定更细化的规则。一旦那些细的规则、标准进一步完善之后，能够预计的是会在公海国际海底划很多保护区，这会对原来的海洋活动造成影响。再就是环评，以后要求在海洋里的重大活动要开展环评，之前是没有的。所以说增加了很多新规则，带来的影响就是会重塑公海、海底区域原来没有的管护、管理和养护的规则体系，倒逼全球远洋渔业、深海勘探、跨洋航运、海底电缆管道铺设全链条进行合规改造，对这些企业、这些活动今后有新要求。

再一个取得的新进展就是塑料，关于这个条约的谈判，目前文本基本谈成。最初发起谈判的是针对海洋里的微塑料，但是谈着谈着范围就扩大了——整个塑料产业的全产业链，从原材料到生产到使用到最后的废弃物管理，谈了很长时间。所以它现在并不仅限于海洋塑料了，就是对塑料污染有一个国际新协定，对整个塑料产业链也会带来影响。

目前还陷于僵局的是国际海底管理局深海采矿规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开发派和环保派立场分歧很大。环保派提出禁止、暂停深海采矿，开发派则说“要有契约精神，我们和海底管理局签的是国际法保护的的国际合同，我的合同里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所以说目前这两派还很难妥协。

三、多边协同与行业新标准

再一个新趋势就是联合国跨机构协同治理越来越密切，很多机构原本的工作职责里的海洋内容不是太多，但这几年越来越多了。如 IMO 国际海事组织有新规则，一会儿会讲到；还有粮农组织，关于远洋渔业的；还有 UNEP（环境署）；还有贸发会议；还有联合国海洋与海洋法司的职责。海洋领域的内容越来越多。再就是在尼斯开的第二届联合国海洋大会，全球做了 800 多个履约承诺，如在海洋领域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合作等，这是一个多边主义的胜利。大家知道，随着美国在这里退群，包括经济领域有人在质疑全球化是不是死了、全球化是不是有问题了，但是在海洋领域，世界各国很明确一致要多边化，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海洋秩序。这是得到整个国际社会支持的，这也是多边化的一个胜利，也是多边化很让人兴奋的、很让人感到欣慰的一个方向。

还有行业新标准 IMO，针对自主水面船舶，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无人船或者智能船，水面这部分有一个 MASS Code 新规则，目前是非强制的，但是下一步实施了以后，到 2032 年要变成强制的，这部分是最新的规则。还有粮农组织发布的远洋渔业，对于 IUU，全球要溯源追责。这些都是以前没有的，现在是越来越新的。

还有产业强制规制全面收紧。比如说航运领域，IMO 在脱碳的路径上很明确短期措施持续加码、长期的框架博弈不断深化的趋势，关于 CII 的评级要求越来越高，这就会倒逼船东很多责任、很多环节要去降低排放。其中，大家知道中国是造船大国，也是航运大国，全球 Top10 的集装箱港口码头连续十多年有 7 个在中国，所以说国际航运 IMO 等新规则对我们的全球航运和造船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包括渔业，全球公海渔业的配额也不断地在压缩，海工装备、油气部分有越来越多环保要求。还有另外一个新趋势就是蓝色金融会越来越多，包括全球的、联合国的、我们国内的，这也都是新进展。

四、欧美国家的引领效应与对我国的双重影响

欧美国家不断地颁布新的政策，由于时间关系，就不一一介绍了，大家在网上也能搜得到。但是其中有很多引领性，欧盟一直在引领全球海洋治理的新方向、新标准，包括我们十年二十年前关于汽车的排放标准最后都是欧标。在海洋上、海事领域也是欧盟的标准现在在引领，包括碳边境税、水产品 MSC 强制认证，就是把欧盟的标准变成世界的标准。虽然他说了“这是欧盟发布的，管欧盟的成员国”，但是只要中国和他们这些欧盟港口有贸易往来、有船舶往来，就得遵守他这个（标准），你靠他的港，就得符合他的标准。所以虽然他说“我只管我的欧盟成员国”，实际上管着所有和他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包括水产品，中国的水产品要不要进口？如果进口到他那儿，就得按照他的标准来，所以说会有很多影响。包括英国有一个全国海洋脱碳战略，目前有很多指标性，是硬指标。

总体来看，全球海洋治理呈现的是规则提速完善、结构短板并存，因为有一部分规则谈成了，一部分谈不成，目前总态势是旧规则在优化、新规则在落地的窗口期。多边主义仍然是主流，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也有很多严峻的挑战。

对我们来说，正向赋能，我们认为提供新机遇实际上就是倒逼我们传统的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这与 2001 年我们加入 WTO 有（得）一比，当年加入 WTO 以后，我们国内的政策、法律、管理、技术很多就是不得不进行转型升级，现在也这样。远洋渔业、船舶航运现在很多就是新燃料、新原料等等，实际上对我们的船舶从设计到建造到使用（都提出了挑战），包括我们的基础设施：港口码头的更新换代。原有的港口码头，外国船靠过来，我们是传统的重油或者柴油，今后你就得有一个燃油、新燃料加注的地方。就像加油站一样，（从）传统的加油（到）现在的加油站都有一个电桩，港口码头今后也有电船、新燃料船，这个港口如果没有这种加注能力，新型船舶就不来了，你就没法接纳了。所以这些是给我们带来的新机遇，包括文旅、海水利用等等，同时会催生海洋新质生产力新兴赛道。比如说深海的生物资源问题，《BBNJ 协定》开始实施以后，对我们国家深海的生物医药产业会提供一个新空间。包括蓝碳经济也是一个新的（政策），“十五五”规划里也有，包括蓝色资本、蓝色债券发行等，也包括国内的法治和营商环境，对应着国际协定、国际新标准，我们一定要对标对表，包括要构建我们的蓝色 GDP 核算体系，也拓展新的合作空间。

现实挑战。绿色贸易壁垒会增加我们的出口成本，对沿海部分省市来说，偏远的、中小的转型会有困难。另外，公海的收缩越来越严，环保标准越来越高，对我们的一些活动也会造成影响。

谢谢大家！

【新时代的中国海洋战略】

新时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演进、成效与任务

金永明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自 2012 年完整提出以来，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时间。所以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梳理和整理，提出一些我们取得的成就、面临哪些问题、今后应该怎么办。我从四个方面展开。

一、新时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五个阶段

新时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主要是从 2012 年以来，我认为经历了五个阶段：一是提出阶段，以党的十八大报告为标志；二是发展阶段，在学习当中提出了与前面四个内容相关联的四个转变，所以是一一对应的；三是成型阶段，具体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提出了陆海统筹的原则/理念；四是深化阶段，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就如何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特别是提出了海洋经济、海洋科技等在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中的重要性；五是升华阶段，代表性的文件就是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第二个指标是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建设海洋强国就是要落实“十二字方针”：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这三个不同层面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对国民、对社会、对国家，只有同心发力，才能够把海洋强国建设好。

二、建设海洋强国的五个方面成效

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十多年时间，我认为在五个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第一，在海洋公共产品上，我们进一步地充实和丰富了“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在海洋组织机构上，自十八大以来，进行了三次机构改革。但是从海洋的情况来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重组国家海洋局阶段，设立了国家海洋委员会，建立了中国海警局；二是撤销国家海洋局阶段，把中国海警局的对外维权执法纳入了武警部队，成为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

为了这样的转隶工作，中国海警局由国务院行政系统向武警部队隶属，所以通过了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因为如果马上转变，最理想的就是制定一部法律，但是来不及，所以作为一个过渡时间，作了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特别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它可以做什么，即职权和任务；如何与其他部门之间协调关系。对于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已经在《中国海警法》中

明确了任务；对于决定上的第二部分内容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需要在今后制定新的法律或者协调其他部门之间的法律关系。

第三，在海洋权益的维护上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确保了国家的重要利益。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我们要发展海洋经济，加快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要有这样的安定环境，那就是我们面临的海洋上的争议问题要和平地解决和处理，使得不影响我们的开发进程、海洋经济发展进程。

所以从国家来看，主要是美国和日本；从海洋的情况来看，从我们的近海来看，主要面临着“四海”或“三海”：东海、南海、台海。我把台海也作为海洋战略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要解决台海问题，要通过海陆空的海洋来解决，所以是一个大海洋的问题。当然，我们在这些过程中，特别是2012年以来对钓鱼岛、东海、南海，刚才吴院长也讲了很多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有没有解决问题？这是存在问题的。

从南海问题来看，实际上有多个层面的博弈：仲裁案主要是法律、司法；还有现场的维权执法，包括维权维稳的问题；还有一些理论上的航行自由行动；包括西沙群岛的直线基线整体性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包括外国军舰。

在这里回应一下刚才吴院长的问题，在领海的无害通过制度上，我们三个法律：一是1958年的《声明》，二是1992年的《领海毗连区法》，三是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在这三个文件当中，对于外国军舰进入中国领海的内容、用词是不统一的。所以我认为从两个层面来解决问题：首先要统一，要把事先许可、事先通知统一，要么全部有，要么全部没有；逐步消除限制论，在程序上的限制论适用绝大多数国家的自由通行论、自由航行论，因为在自由航行论问题上，事先通过许可的只有40多个国家这样做，所以从绝大多数（193个）国家的情况来看，我们还是少数派。从本身中国的海洋地位、发展进程来看，需要取消事先许可论。

第四，我们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海洋治理观。应该说这都是中国在海洋上的自主知识体系上的贡献。

第五，我们在建设海洋强国的任务中，去年7月1日提出了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十五五”期间的重大任务、中心任务，适用到海洋，那就是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并且提出了具体的一些要求：五个基本要求、六大任务。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后面提出了六大工程，对五个要求、六大任务提出了后面的要求。

三、面临的挑战与保障路径

我们在建设海洋强国中会面临哪些挑战，如何保障？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海洋强国的具体概念到底是什么。总体来说，国际社会没有统一的概念，但是它的关键词是强制。所以如何解释强？在哪里强？我是从“五位一体”的角度来进行考虑的，即从政治、经济、生态、文化以及安全的角度来进行建构。

所以海洋强国是指平时从海洋可以获得更多的海洋资源和空间里，在应急时具有快速处置海洋灾害、自然灾害的成果，投送力量保护海洋利益和安全的强大国家。这样就能够维护海洋秩序，为海洋

作出贡献，所以特别需要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上力量的互动和保障。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方面还面临一些困难。

第二，具体来说，正如刚才所说的，从国别来看，主要是美国和日本。所以要如何处理好中日、中美之间的关系问题？

1.对于美国来说，大家都知道是在“航行自由”上的争议。

2.对于毗连区当中的安全事项的管理。毗连区一般来说从国际法的层面来看，主要是对四个事项：海关、税收、卫生等。在国内的国内法《领海毗连区法》当中对安全事项也进行了管辖。从国内法的角度对安全事项进行管辖，国际社会只有五个国家，所以是极少数的国家。

3.对南海线的性质和地位的争议。那就是南海断续线到底是一条什么性质的线，它的划界、主权、历史性权利是如何体现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主权的性质；划界起始工作线的功能；历史性权利的功能。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要素。当然，还涉及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效率问题，刚才吴院长已经讲了很多。

所以这些问题不仅是国际社会的疑难问题，也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理论难点。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难点？因为《海洋法公约》是一个折中协调、一揽子交易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模糊，在实践当中会出现争议，所以要根据后面的国家实践、理论发展来进一步地丰富、发展和完善。

对于中日两国来说，作为近邻，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问题，新旧问题并发使得中日关系相当脆弱。所以老问题都没有解决，新问题不断地出现，使得中日关系处于一个很严峻的状态。虽然我们有这样的问题，但是通过努力，应该说已经达成了很多共识，特别是一些原则性的共识，这是框架性的，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文件，但是对于缓和有关问题应该说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我们要讲一下海洋强国战略如何才能保障实现。我认为从国内情况来看，要强化海洋管理制度。因为国际区域的一些制度由不得我，需要时间、需要协调、需要平衡，而国内有关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主、可以加快进程。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组织机构体制，包括国家海洋委员会真正的功能落实定位。

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海洋法》。从 2007 年以来，我们一直叫《海洋基本法》，但是从 2023 年 9 月 7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进程来看，它已经把《海洋基本法》改为《海洋法》，并且列入第二类项目。所谓第二类项目就是条件成熟时再提议、审议、通过，这是一个努力方向的问题。

《海洋法》的制定按照什么模式来制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单一法，那就是与以前的《海洋基本法》那样的类型是一种政策性的宣示，这样就比较容易协调与其他现存的与海洋有关的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存在很多修改。第二个模版是海洋法典。刚才吴院长也说了，到现在为止我们有两部重要的法典：《民法典》和《生态环境法典》，所以海洋法典能不能够成为新一部的法典的重要内容有待继续努力。

在海域执法方面有很多焦点：在南沙岛礁，因各种原因，我们没有公布领海基点基线，所以使得我们在海上执法存在着很多边界模糊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海警法》第三款规定，中国海警局及海警机构的适用范围是中国的管辖海域。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管辖海域范围是不明确的。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海域范围；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超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范围以外的海域也是我们可以管辖的海域，这就是历史性权利。

但是正如刚才吴院长所说的，历史性权利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还是停留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十四条的范围内，我们有历史性权利，但具体在哪里有、有什么，包括在仲裁案发布的 2016 年 7 月 12 日的政府声明当中也没有，只是列举了有历史性权利。所以说依然要明确管辖海域的具体范围，包括根据历史性权利所涉及的范围，这也涉及南海断续线的定位、性质问题。

管辖海域怎么样才能够确定？无非就是两个层面：一是国内法进一步明确，公布我们的基点基线。关于我们公布南沙群岛岛礁的基点基线，从方式上、内容上、标准上等等会造成很大的困境，比如说陆域吹填怎么办？二是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海域划界工作。但是因为受到裁决的影响，东盟的一些国家就不跟你玩，因为你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岛屿，所以没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第四，我们建设海洋强国，在建设海洋强国获得的指标要外溢到为海洋命运共同体服务，为双边、全球的海洋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谢谢大家。

【新时代的中国海洋战略】

21 世纪海洋战略的变与不变

胡波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负责人

关于海洋强国和海洋战略，国内外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说法：第一个说法，“中国不搞地缘政治，我们也不搞 power politics”，很多官员、很多学者都是这么讲的，包括很多研究地缘政治的学者居然说“我不做 power politics”，我说“那你做什么？”第二种极端（国外比较多），认为中国的海上崛起道路和其他国家没什么区别，和历史上的英国、荷兰、西班牙、美国没什么区别。我经常在中间，所以天天与人吵架。

我的题目是《21 世纪海洋战略的变与不变》，我觉得 21 世纪海洋战略有变的地方，也有不变的地方。原因有几个，我们讲全球海洋政治是由几个因素决定的：一是地理；二是科学技术发展；三是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这三者是有联系的。当然，地理因素因为技术因素的改变也在变化，由于这三者因素的变化，所以今天我们当然不能说我们还是延续英美的道路，但是我们也远没达到说“中国就不搞 power politics”的程度，人类没有到全世界大同的程度。

一、地理空间

地理空间有很多理论，比如说我们讲岛国天然地比大陆国家的地理要素好，马汉讲了一点。但有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人类在不断突破地理的限制和地理的障碍，但是到目前为止，现在人类的能力没有完全突破地理的限制。

举个例子，你的洲际导弹可以打 1 万公里、2 万公里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先不说你的东西能不能天天使，即便能够天天使，你的投送效率也比不上轰炸机和航母舰载机。为什么大家除了做洲际导弹，还要做中程、短程和其他装备？就是因为这个地理因素仍然很重要，美国打伊朗动用了上万架次的运输机运输物资。

习主席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这其实也是讲地理，因为中美不是邻国。历史上的大国竞争包括艾利森做的那些例子都是邻国，所以他们的“修昔底德陷阱”在现阶段不值一提，但是人家名气比较大，所以影响很大。但实际上有很多漏洞：第一个漏洞，中美不是邻国，如果是邻国，你的地缘张力、接纳程度就会低很多。所以“地理无用论”肯定是有问题的。

另一方面，地理对人类来讲，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 19 世纪讲海洋是一个一维空间，水面舰艇是一个一维空间。今天从水面到水上到水下到太空到电子频谱是五维的，这确实有变化，这个变化会导致很多后果。所以地理本身是静态的，但是因为有技术的加持，它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人类现在唯一没有征服的就是水下，人类有很大认知障碍的就是水下。

二、军事技术：有利于防御而非进攻

我们看军事技术。第四次科技革命现在还在进行，现在有很多说法，但是现在颠覆性的技术都没有出现，大家说水下有可能产生颠覆性的技术。比如说水下通信，天空我们都有感知，但是水下你看都看不见，通信更困难，更不用说去打仗。我们文科生经常会被科学家骗，他们经常夸大其词，把他的实验室模型下的东西拿出来，让媒体去炒作，认为这个东西马上就实现了，这很难，所以目前依然在探索过程中。

但是我简单说：二战以后，包括现在的科学技术革命，科技发展、技术发展有利于权力的分散，而不利权力的集中。同时，技术发展有利于军事防御，而不利进攻。这与二战以前的前 500 年是有很大区别的，前 500 年，为什么英国等大国能够交替成为霸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技术的发展有利于权力的集中，而不是分散，而且是有利于进攻的，所以会导致强者越来越强。但是二战以后，这个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反介入/区域拒止”代表一系列技术，包括导弹、太空、定位技术、无人机。我们看到今天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面临的问题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不可能出现，舰炮马上就给你摧毁了。但现在美国真是拿这个东西没有太好的办法，他那些装备都是在超视距外去打击对手的，在开阔水域没有问题。伊朗说在阿拉伯海打美国的航母，那是行为艺术，根本就打不中。现在能打中美国航母的也就东大、也就中国，我们 1995 年、1996 年之后就练了这个，其他国家没什么可能性。但是狭窄水域就不一样了，所以军事技术的发展是不太利于大国向海外投送力量和进行军事力量使用的。

三、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

第三个影响因素是国际规范、国际制度。二战以后有哪些国际制度对海洋强国有影响？

一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全面流行。二战以前，全球可能 30 个左右民族国家，到二战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 190 个（接近 200 个）民族国家。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民族体系一旦形成之后，也再也没有空间了，而且民族主义盛行。所以美国这两次行动：对于委内瑞拉的行动和对于伊朗的行动，委内瑞拉是一个特例，伊朗才是人类的常态。你现在靠军事力量去压服另外一个中小国家，哪怕是中小国家都很困难。委内瑞拉比较特殊，他不抵抗，要和平解决争端，和平解决、调平一系列东西，无论大家信不信，至少嘴上这么说，美国也要在嘴上说，俄罗斯也要在嘴上说。

另外是海洋自由，二战以后海洋自由的发展是不太利于海洋强国的，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为止美国依然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那是一个“屌丝的盛宴”，是有利于中小国家的，我大国就不做这些东西。

所以从地理、技术到国际规范方面的发展，我们强调战争和军事层面的影响，总体来讲，是不太有利于大国、海洋强国的。

四、四点启示

基于这个，我们得出了四点启示，海洋地缘政治肯定是没有过时的，它现在有新的意义，有四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海洋地缘政治全面回归。因为大国竞争、海洋争议的问题（不仅是南海、东海，全球都有，美国加拿大也有）、全球海洋治理的问题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现在我们面临地缘政治回归的趋势很明显。

第二，因为军事技术和国际规范的发展，导致未来可能不会再有一个世界性的海上霸权。也就是说无论其他全球性的整体格局是两极也好，还是多极也好，但是对于海上来讲，是一个很明显的多极格局：海上多极形态。首先，美国已经很难再延续它的海上霸权，我们也成为不了美国这样的海上霸权。

第三，海洋政治特别是国际海洋政治的主题将会日益丰富。传统上，二战以前，基本上能够影响国际关系的海上事务就是权力竞争，打渔都不会影响，因为你在周边打渔不会影响别人。但是二战以后，首先“200 海里经济专属区”的前身就是因为渔业纠纷，因为你的捕鱼技术发展导致了发展议题，导致海里的石油、天然气（的问题显现），所以发展议题成为了国际海洋政治的一个主题。到 21 世纪，因为全球性的海洋问题导致全球海洋治理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讲海洋政治或者说海洋强国，我们不讲国内的事，我们讲国外的事，它面临着三个层面的主题：权力、发展和治理。

第四，今天中美的海上竞争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我们在短期内是见不到确定性结果的。我们如果从 2008 年开始算，实际上已经快 20 年了。中美海上摩擦早于其他领域的摩擦，已经接近 20 年了。经过 20 年的斗争，基本上刚才郑老师讲的我非常同意，美国现在基本上把你当成一个正儿八经的对手来看待，因为他现在很多指标真的不如：首先，他的船没有你多；第二，在水面、空中很多领域我们都追平了，他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水下。另外，他已经明显地发现了乌克兰战争对伊朗的冲突，大规模的冲突，如果没有制造业，那是万万不能的。所以现在特朗普和赫格塞思天天讲的就是“真的不能和中国打仗”，这件事当时也不是因为特朗普，从拜登开始旧金山峰会以后，双方的信号都很清楚：我们要竞争，但是不要武装冲突。

中美的海上竞争有几个特殊的地方：第一，我们的地理上是不同的，与传统历史上的大国竞争不同。第二，技术条件不同。我们今天有“反介入/区域拒止”，所以在西太平洋，美国就是真的折腾不过中国，只要我们发挥正常，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发挥不正常，你太弱了，只要你稍微强一点，他就不可能取得优势。当然，同时比如说你到了大西洋、印度洋，你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其他地方面临的问题，中国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你要知道今天的大国向海外投送力量和应用力量是会受到很多限制的。第三，我们今天的规范制度/制度体系不同。今天都是民族国家体系了，这是很重要的，这也不同。包括海洋自由等一系列规范不同。第四，最重要的一个不同是中国确实和他们不同，中国的家当要是让俄罗斯拿起来，双方早就兵戎相见了。中国确实是内向型

的、爱好和平的，我们确实不同，我们的不同在于：历史上很多都是同质文明之间的竞争，我们相当于异质文明的竞争，我们会带来新的变量。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美在海上的战略竞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觉得很多国家对此都有误判，俄罗斯误判了，俄罗斯打乌克兰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认为“坐山观虎斗，因为中美竞争，所以美国的重心在中国身上，所以他有扩张的空间”。伊朗也误判了，2022年、2023年天天在中东搞扩张，也是觉得美国现在没有什么精力再管它。菲律宾也误判了，菲律宾认为中美的竞争就是历史上的竞争，马上就会兵戎相见，然后他在南海有空间。日本也是一样的。这个误判有两个层面：第一个误判就是马上会有大 show down、大冲突，很快就解决。第二个误判就是认为美国会很快抛弃他们，所以要显示自己的价值。这本质上也是一种误判，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我觉得短期内都看不到这个情况。所以现在中美强调双边走向稳定，我觉得这确实是双方选择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谢谢。

【IPP 动态】

IPP 动态

(2026 年 4—6 月)

【重要动态】

►IPP 国际会议入选“广东国际传播 500 个年度案例”

近日，广东正式发布公共文化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领域“三个 500”年度成果。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国际会议成功入选广东国际传播 500 个年度案例，位列“事事有传播”类别。

►IPP 学者参与两项目荣获第十一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近日，第十一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正式发布。IPP 资深研究员、广东新质生产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余浩参与撰写的调研报告《构建服务科技自立自强的新时代科研组织管理体系》（作者：李石勇、叶托、蒋余浩、焦磊、蓝满榆）荣获一等奖。IPP 行政副院长、助理研究员刘金程参与撰写的调研报告《理性看待国际大学排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作者：朱永东、焦磊、杜娟、张若梅、汪昉、刘金程）同获一等奖。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国际关系学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2026 年 6 月 6 日，由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与华南理工大学共同主办，IPP 承办的“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国际关系学学术研讨会”在校

五山校区召开，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智库及政府相关研究机构等单位的 50 余名专家学者与会。校党委副书记麦均洪、IPP 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出席并致辞。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士存、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金永明、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原所长张海文等 9 位权威专家，围绕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海洋空间的运筹与塑造等主题作专题发言并展开深度对话。

►IPP 举行“中国企业出海”专题研讨会

5 月 29 日，IPP 举行“从‘走出去’到‘走进来’——中国企业高质量出海的战略转型与路径升级”研讨会。美国向日葵集团（香港）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广州市番禺区新业态企业家商会会长胡宏华，广州市白云区云非国际贸易服务中心胡述华，工控国际控股（广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阮月梅，广东顺德为艾斯机器人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总经理胡余良等企业界嘉宾基于企业运营实践，分享了各自关于中国企业出海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观点；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嫚丽，IPP 资深研究员赵巍，IPP 执行院长、研究员郭海则结合企业调研发现，分享各自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郑永年文章入选《新华文摘》

最新出版的《新华文摘》2026 年第 13 期在封面及首篇收录了郑永年教授发表的《中国外交的文明底蕴与实践逻辑》一文。本文最初刊载于《国际问题研究》2026 年第 1 期。文章立足中国外交转型的历史演进与现实方位，深入阐释中国外交从“有所作为”迈向“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战略逻辑，系统回应部分西方国家所谓“中国冲击论”“国强必霸论”等对华消极叙事与误读。

►郑永年参加“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

5 月 7 日，“APEC 研究中心联席会议青年学者论坛”在深圳举办，这是 APEC 历史上首次专为青年学者举办的学术论坛，吸引 13 个经济体的青年学者代表及 APEC 秘书处高级官

员出席。郑永年教授出席论坛，并在高桌晚宴上发表主旨演讲。

►IPP 四项研究荣获 2025 年度“广东省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近期，广东省级软科学项目专业管理机构通报了 2025 年度广东省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名单。由郑永年教授领衔的《全球基础研究趋势与大湾区的应对策略》等四项成果被评为优秀成果。本次评选共选出 43 篇优秀报告，华南理工大学有 9 篇优秀成果入选。

►IIPP 参加中宣部哲社办工作研讨会

4 月 9-10 日，IPP 执行院长郭海、行政副院长刘金程陪同校党委副书记麦均洪赴京接连参加中宣部理论局举行的中宣部意识形态分析研判重点联系单位启动会商会议以及中宣部全国哲社办举办的高端智库联络员工作会议。

【院务 · 交流】

►校期刊中心林川在 IPP 举办学术期刊论文交流指导会。

2026 年 7 月 3 日，学校期刊中心（学报编辑部）编辑林川到访 IPP，就学术期刊选题和写作举行内部交流指导会。林川从编辑视角出发，介绍国内学术期刊的运作和管理、拆解稿件处理流程和要点，回应了青年学者在期刊论文写作和投稿过程中常见的问题和需求。

►中意学者产业政策研讨会成功举行。

6 月 18 日，IPP 联合工商管理学院及意大利应用经济学大学联盟（CiMET）举办以

“Industrial Policy in the Era of Multiple Crise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为主题的产业政策研讨会，来自中国和意大利的学者分享了他们针对产

业政策的最新研究。本次研讨会是继 2025 年的两次学术活动之后再次举办的交流，有助于中意两国学者深化和开展合作研究，促进双方的学术沟通以及对政策的相关理解。

►IPP 举行国社科基金申报论证及遴选会。

5 月 27 日，IPP 举行 2026 年国社科基金申报论证及遴选会。社科处处长李石勇，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文宏，法学院副院长徐树作为评审专家对 8 位 IPP 研究人员申报选题的研究框架、创新点、难点等进行了深入点评，并与申报人展开答疑交流。

►IPP 举行全院工作会议。

5 月 29 日，IPP 召开全院工作会议。工作会议重点总结了 2026 年上半年的工作情况，全

体研究人员交流了 2026 年上半年工作成果与心得，并对下半年的工作进行展望和部署。

►戴明洁参加中央党校科研骨干研修班。

5 月 14-27 日，IPP 研究员戴明洁受邀参加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 2026 年度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并参与研修班研究报告、党校内参撰写等工作。

►IPP 参加湾区智库委员会理事会

4 月 28 日，粤港澳大湾区区国资国企智库委员会一届三次理事会议在中国科学院深圳举行，湾区智库委员会 19 家成员单位代表 40 余人参会。会议审议通过委员会 2026 年工作方案和 2026 年年度报告大纲。IPP 执行院长郭海参加本次会议并作为理事代表发言。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到 IPP 调研

4 月 28 日，大连理工大学科研院副院长兼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姜沃函等一行到访 IPP，就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国家级重大平台建设等展开调研。学校社会科学处处长李石勇主持会议，并介绍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情况；IPP 行政副院长刘金程介绍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相关情况。

►法国资深出版人摩耀武到访 IPP。

4 月 15 日，法国 GTIF 公司总裁摩耀武（Guillaume MOREL）到访 IPP，就联合策划出版当代中国发展相关外语出版物等事项开展交流。学校出版社党委书记张明、社长房俊东等出席交流。

【学术 · 研究】

►IPP 学者参加第十九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

7 月 5 日至 6 日，第十九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在北京辽宁大厦隆重举行，本届年会以“AI 时代的权力、秩序与社会科学研究”为主题，IPP 多位学者应邀出席会议，并以团队形式深度参与了“技术加速时代下的世界秩序转型”等两个专题研讨环节。

►郭海参加第二届国家安全法治论坛

6 月 27 日，第二届国家安全法治论坛在中山大学举行。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 50 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等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IPP 执行院长、研究员郭海参加论坛并发言。

►朱雁翎参加国际传播学会国际会议

6 月 9 日，IPP 副研究员朱雁翎参加 2026 国际传播学会媒体社会学会后研讨，并在会上作题为“Between Diplomacy and Entertainment: How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rs’ Culture Influences Digital Regulation Across China’s Social Media”的汇报。

►IPP 举行中国绿色产业专题学术工作坊

5 月 21 日，IPP 在研究院举行以“The Green Industr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Logic”为主题的学术工作坊。IPP 客座教授、巴西利亚大学教授白乐思（Moisés Villamil Balestro）、德国不来梅康斯特大学博士研究生海格（Alexander Alban Reik）分别就广州的绿色制造和中国的新能源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展开研究分享。

期间还举行了白乐思教授受聘为华南理工大学客座教授仪式，IPP 执行院长郭海为其颁发聘书。

►IPP 举行多场明远讲坛学术活动

4 月 8 日，IPP 第 26 期明远讲坛特邀百度飞桨广州中心（粤桨）副主任、首席技术官，海珠区人工智能百人会常务副会长陈云峰作题为“大湾区 AI 产业落地及生态繁荣”讲座，学校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意担任与谈人。

5 月 11 日，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田雷教授做客 IPP 明远讲坛，并以“关于‘当代美国’的多元观察——一个学者、译者和出版者的视角”为题发表讲座。结合自身在美国宪法史、法学翻译与学术出版等领域的长期研究与实践，田雷围绕当代美国社会变迁、政治秩序演化与中国学界对美国认知的变化展开分析。IPP 资深研究员蒋余浩担任讲座评议人。

5 月 15 日，中山大学法学院姜峰教授做客 IPP 明远讲坛，并以“税收法定原则的本土理解及其影响”为题开展讲座。讲座中，姜峰围绕税收法定原则的引入、本土化理解及其制度影响展开系统分析。广东省宪法研究会会长、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党委宣传部部长夏正林教授担任讲座评议人。

6 月 23 日，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江照信教授做客 IPP 明远讲坛，并以“美国国家

安全法对于中美战略稳定关系之影响——一个初步的看法”为题开展讲座。讲座中，江照信围绕美国的三重法律面孔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美国国家安全观展开深入分析。IPP 资深研究员蒋余浩、法学院胡赫男担任讲座评议人。

►徐伟钧参加第九届世界政党与国家治理论坛

5 月 16-17 日，IPP 副研究员徐伟钧赴上海参加第九届世界政党与国家治理论坛，并于“亚洲政党政治新格局与新趋势”单元作题为《一党优位制下日本极右翼政党的兴衰逻辑——以日本参政党为例》的发言汇报。

►赵巍参加多场中欧关系专题会议。

4 月 23-24 日，IPP 资深研究员赵巍受邀参加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及上海欧洲学会联合主办的“欧盟的「7D」：跨党派视角与中国因素”会议及 ESSCA 欧亚研究院 Jean MONNET 项目会议，并在会上就中西方关系演变和后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发表演讲。

►《中国科学院院刊》执行主编杨柳春到访 IPP

4 月 8 日，IPP 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刊》执行主编、编辑部主任杨柳春到访 IPP，并以“智库期刊的选题策划与传播策略”为题交流分享。社科处处长李石勇主持活动，学校期刊中心主任张乐平及 IPP 全体研究人员参加讲座并与嘉宾展开深入对话。

公共政策研究院简介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所为中央提供独立决策咨询的国家高端智库，成立于 2012 年，由华南理工大学知名校友及企业家莫道明先生与华南理工大学共同创办，由国际顶尖政治学学者、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2015 年，IPP 被中宣部认定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2017 年，IPP 成功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核心智库”榜单；2022 年，IPP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认定为“重点政策研究合作单位”；2025 年，IPP 被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认定为“中央网信办舆情合作培育单位”。

IPP 以决策咨询为“安身之本”，以学术研究为“立命之道”。在郑永年教授的带领下，IPP 专注于三大领域的政策研究：大国外交、产业经济及社会治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IPP 每年撰写并向相关部门提交高端政策报告百余篇，其中近三分之一的成果得到高层重视。

电话：020-87112324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381 号华南理工大学

官网：<https://ipp.scut.edu.cn/>

微信公众号：IPP 评论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政策咨询：(8620) 87111850 E-mail: liujincheng@ipp.org.cn

公共关系：(8620) 87112340 E-mail: media@ipp.org.cn

出版物订阅：(8620) 87111856

地址：中国广州天河区五山路381号汽车科技大楼15楼

邮编：510640

官方网站：http://ipp.scut.edu.cn

官方微信：IPP-REVIEW

今日头条：IPP评论